

# 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

李貴生\*\*

(收稿日期：106年4月19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10月17日)

## 提要

陳寅恪別樹一幟的文史互證法，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內一直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然而自錢鍾書對他的著作提出尖銳的批評後，不少學者開始強調陳寅恪所做的只是歷史研究，與文學無關，鮮有認真正視陳氏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看法。割裂陳寅恪與文學的關係，不但不符合陳氏對一己著述的理解，還模糊了他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實際位置。針對這種偏頗的意見，本文首先回顧錢鍾書的評論，繼而考察文學與歷史在陳氏研究中所佔的位置，並逐一探討歷史與文本解讀、文學鑑賞之間的關係，以期全面和客觀地評估陳寅恪在文學領域內的意義和貢獻。

關鍵詞：陳寅恪、文學、批評、歷史、詮釋

---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Grants Council）資助項目（編號18600015）的部分研究成果，復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謹在此一併致謝。

\*\*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從錢鍾書的批評談起

陳寅恪是 20 世紀享負盛名的國學大師，學問淹貫古今、融會中外，受到同代及後來學者的一致推崇，其別樹一幟的「文史互證」研究法貫通文學與史學，尤其引起廣泛關注，影響深遠。<sup>1</sup>陳寅恪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內取得矚目成就，應佔一席之地，本是不勞贅言的事，學界過去對此亦從無異議。如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撰寫考語時，本稱陳寅恪「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謹，往往能用人人習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問題，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後改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與文學史」，<sup>2</sup>特別點出陳氏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然而自錢鍾書 1978 年在意大利發表了一場演說後，陳寅恪與文學研究的關係逐漸出現微妙的變化。

錢鍾書在那場演講中首先提到「對實證主義的造反」，認為 1949 年前的中國在清代樸學的餘威和歐美實證主義的影響下，文學研究與考據、科學方法幾乎成為同義詞，然後不具名地批評陳寅恪的研究是「自我放任的無關宏旨的考據」：<sup>3</sup>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

<sup>1</sup> 學界基本上都認同陳寅恪早期的《元白詩箋證》和後期的《柳如是別傳》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他的文史互證研究法。1994 年中山大學即以「《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傳統」為題召開會議，其後編訂的論文集收錄 19 篇文章，當中 15 篇討論《柳》書，見胡守為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在其他學術會議或紀念文集中，文史互證依然是研究的焦點所在，如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618-658；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1989 年），頁 337-347；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84-204、235-245、279-364。此外尚有不少專著及論文探討這個課題，如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頁 121-223；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頁 141-151；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72-197；向天淵：〈「文史互通」與「詩史互證」〉，《中國比較文學》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107-118；陳先明：〈試論陳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證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5 期（2003 年 5 月），頁 62-65；陳建華：〈從「以詩證史」到「以史證詩」——讀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札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74-82 等等。

<sup>2</sup> 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1947 年 10 月 23 日條，頁 152。

<sup>3</sup>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頁 179。

文學研究。<sup>4</sup>

錢鍾書並不是第一個把考證太真入宮一事視為繁瑣無聊的人，夏承燾、鄭天挺、卞孝萱和中山大學的學生在1950年代左右已提出類似的意見。<sup>5</sup>然而由於錢氏同樣是博通中西、聲譽極隆的大學問家，加上那場專題發言據說「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sup>6</sup>並非率爾之作，如此份量的學者刻意用「自我放任」、「無關宏旨」、「無謂的問題」等嚴重字眼批評陳寅恪，很快觸動同行的情緒和關注。牟潤孫在錢氏發表演說後不久即撰文回應，認為「陳寅恪先生是史學家，陳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是以史論詩。……文學家的工作是文藝的分析與批評，史學家則要考證其中事實」。他把文學家和史學家對立起來，並且指出太真入宮一事可與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之說互相引證，因而堅稱這是「歷史家所不能忽略之事」。<sup>7</sup>

牟氏的議論引導了史學界對陳、錢這段公案的看法，此後不少學者言及陳氏文史互證的著述時，都會強調他所做的是歷史研究，與文學無關。汪榮祖認為陳寅恪箋詩乃「為史學致知關一新途徑」，「其旨趣自與正統詩評家有異」；<sup>8</sup>嚴耕望說陳氏「論詩著眼於以詩證史，仍是史的範圍」；<sup>9</sup>許冠三謂陳氏不是要將「文史打成一片」，「他的箋詩用意主要是化詩詞為史料」，供史家參考；<sup>10</sup>李洪岩亦說他「做的只是考史，不是錢鍾書所謂『文學研究』」；<sup>11</sup>李玉梅則強調陳寅恪是以史家身份箋詩，不同類別的文學作品在他手中只是「作為研究歷史的材料」。<sup>12</sup>錢鍾書逝世後，余英時憶述1979年曾親聆錢氏批評「陳寅恪太

<sup>4</sup>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179-180。

<sup>5</sup> 夏承燾在1949年發表〈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已指出「陳君考證之文，往往亦不免過深過瑣之失」，不過文中並無提到太真入宮一事，見《國文月刊》1949年第78期（1949年4月），頁8。唯《元白詩箋證稿》全書出版後，不少人就太真事提出批評，鄭天挺1953年的日記已有「近來學者每舉寅老考證楊太真入宮是否處女為史學界之病態，頗多誹議，具有詆諆之意」的記述，轉引自張求會：《陳寅恪叢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7。至1958年卞孝萱〈對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一些意見〉亦謂「《元白詩箋證稿》全書中的考證，有許多是無用的，例如楊玉環是否『以處子入宮』之類等」，見《文學遺產》編輯部編：《文學遺產選集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99；翌年李春棠等〈陳寅恪教授和「元白詩證史」〉亦批評「陳老花費了大量時間來考證楊貴妃的身體是肥的還是瘦的，臉龐是圓的還是長長的，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等問題，見《史學月刊》1959年第4期（1959年4月），頁19。

<sup>6</sup> 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11。

<sup>7</sup> 參牟潤孫：〈陳寅恪與錢鍾書——從楊太真入宮時是否處女說起〉，見《海遺叢稿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64-165。

<sup>8</sup>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頁151-152。按此節並不見於1976年香港波文書局刊行的版本。

<sup>9</sup>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70。

<sup>10</sup>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6年），頁252。

<sup>11</sup> 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貴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1996年10月），頁52。

<sup>12</sup> 參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頁127-128。

“trivial”（瑣碎、見小）」，他本想回應「陳氏那番考辨是為了證實朱子」的大議論，不能算 trivial，不過那時錢鍾書是客，因此不便當眾說出口。<sup>13</sup>季羨林則把不便說的都說出來：「無怪一個學者說：這太 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風。……看來這位說那樣話的學者是根本不懂歷史的。」<sup>14</sup>

眾人竭力維護陳寅恪，甚至不惜反唇相稽，批評錢鍾書不懂歷史，用心可以理解。然而要為陳寅恪開脫，實在沒有必要迂迴地牽合朱熹的偉論，因為讀過陳氏著作的人都知道，「唐源流出於夷狄」乃《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論題，但《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章考釋考證太真入宮事時卻從未提及相關的說法。把二者連繫起來，純屬擁護者一廂情願的想法，陳寅恪本人已清楚說過「太真入宮始末為唐史中一重公案」，辨證此事「雖於白氏之文學無大關涉，然可藉以了卻此一重考據公案」，<sup>15</sup>明言那番考證雖與白氏文學無關，卻自有其目的及學術意義，不是「為了證實」或「研究」李唐家風。錢鍾書的批評本不難回應，令人驚訝和惋惜的是，上述學者為了迴避繁瑣之譏，竟把陳寅恪的研究限制在史學專業之內，此舉表面看來似乎能夠維護陳氏的聲譽，實際上卻是把他驅逐出文學的範疇之外，間接認同了錢鍾書的批評，不再把陳寅恪的著作視為「嚴肅的文學研究」。其實錢鍾書的演說從未否定陳寅恪與文學研究的關係，只是表示陳氏的方法已不再流行，尊敬陳寅恪的人反而硬要抹煞他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這種做法未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恐怕陳寅恪本人也難以苟同。

回顧 1930 年清華學校易名為清華大學，學界的傳奇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亦一併結束，當時原任國學院導師的陳寅恪遂轉任「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並為中文研究所、歷史研究所開專題課。中文系和研究所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等」，<sup>16</sup>又在《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發表文章。<sup>17</sup>蔣天樞記述「是時先生授課之餘，精研羣籍，於唐代文學及佛經多所涉及」，並引錄了陳寅恪論「唐代文學特富想像」之緣由，以及他閱讀吳汝綸評注《韓翰林集》時的案語。<sup>18</sup>可見陳氏的工作單位、講授科目以至研究課題從不局限於歷史範圍，而且他在著述中提及心目中的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時，亦不時提到研治文學的學者。如〈論韓愈〉文末云「草成此文，以求當世論文治史者之教正」，<sup>19</sup>〈書

<sup>13</sup>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何暉等編：《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頁232。

<sup>14</sup> 季羨林：《季羨林談讀書治學》（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頁6。

<sup>1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14。

<sup>16</sup>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5。

<sup>17</sup> 如〈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等，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97-300。

<sup>18</sup>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頁75-76。

<sup>19</sup>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332。

杜少陵哀王孫詩後》謙稱文章「不足供說詩治史博學通識君子之一覽」，<sup>20</sup>〈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言可「供治小說考證者採覓」，<sup>21</sup>〈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謂對「治小說文學史者」或有一助，<sup>22</sup>〈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或亦可為治中國小說史者之一助」，<sup>23</sup>《元白詩箋證稿》則可為「今世之治文學史者」說明比較研究的方法，<sup>24</sup>〈韓愈與唐代小說〉亦是要論證「吾國中古文學史上的一大問題」。<sup>25</sup>他晚年的鉅著《柳如是別傳》也經常出現「特標出之，以告論文治史之君子」，<sup>26</sup>「略考釋之，以待研治明季文學史者之論定」等話。<sup>27</sup>這類敘述屢見於陳寅恪不同年代的著作中，若說他的研究俱與文學無關，明顯違背陳氏的本意。

正視陳寅恪與文學研究的關係，再以冷靜客觀的態度重讀錢鍾書的演說，可以發現錢氏的批評不過顯示他與陳寅恪的研究取向不盡相同，<sup>28</sup>不但沒有否定陳氏與文學的關係，反而確認了他在 20 世紀的文學研究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錢鍾書在演說中曾概括樸學與實證主義對文學研究的具體影響：

那時候，祇有對作者事跡、作品版本的考訂，以及通過考訂對作品本事的索隱，才算是嚴肅的「科學的」文學研究。一切文學批評祇是「詞章之學」，說不上「研究」的。

29

根據他的觀察，實證主義式的文學研究包含兩個要素，其一是「對作者事跡、作品版本的考訂」，其二是「通過考訂對作品本事的索隱」。然而錢鍾書沒有說明的是，這兩種研究取向在中國現代學術的草創階段並沒有被視為同一類型，二者之間反而有過激烈的衝突，

<sup>20</sup> 陳寅恪：〈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64。

<sup>21</sup> 陳寅恪：〈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96。

<sup>22</sup>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8。

<sup>23</sup> 陳寅恪：〈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92。

<sup>24</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6。

<sup>2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5。

<sup>26</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北京：三聯書店，2009 年），頁 346。

<sup>2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325。

<sup>28</sup> 錢鍾書素來不滿詩史之說，早年所撰《談藝錄》已批評「近人言古詩即史」之論，參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頁 100-104。其後《宋詩選註》序文更直言「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參見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頁 3；《管錐編》亦指出「盡舍詩中所言而別求詩外之物……。此可以考史，可以說教，然而非談藝之當務也」，參見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18-219。《談藝錄》「補訂」再批評「祇知詩具史筆，不解史蘊詩心」之見。（頁 104）可知他對陳寅恪的批評並非出於偶然，亦非個人是非之爭，而是源於不同的文學研究範式。

<sup>29</sup>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 179。

蔡元培和胡適的紅學論爭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蔡元培從事紅學索隱，深信「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sup>30</sup>但胡適卻認為蔡元培的本事索隱不過是「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純屬「穿鑿附會的『紅學』」，<sup>31</sup>到了晚年仍堅持「『《紅樓夢》的新研究』只有兩個方面可以發展：一是作者問題，一是本子問題」。<sup>32</sup>錢鍾書把蔡、胡兩種取向視為一類，實因陳寅恪的文學研究兼具文獻考訂與情節索隱的成份，所以才會以他為代表，概括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主流方向。

陳寅恪嘗試調和近代兩種互相衝突的文學研究範式，其方法和成果已非樸學或實證主義一類簡單標籤所能概括。本文的目的正是要重新正視陳寅恪的文學研究，把他的文史互證法安放在 20 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的視野下，剖析他的文學批評觀念。文章首先會考察文學與歷史在陳氏研究中所佔的位置，繼而探討歷史與文本解讀、文學鑑賞之間的關係，以期客觀和全面地評估他的研究方法在文學領域內的意義和貢獻。

## 二、文史互證法的基本性質

陳寅恪是一位高屋建瓴、自視甚高的學者，其著作很少提到同代學人，但從字裏行間可見，他對當時學界的研究成果實有不俗的認識。如他箋釋元稹詩時嘗言：

微之夢遊春自傳之詩，與近日研究紅樓夢之「微言大義」派所言者，有可參證者焉。昔王靜安先生論紅樓夢，……其旨與西土亞歷斯多德之論悲劇，及盧梭之第雄論文暗合。<sup>33</sup>

陳寅恪素來敬重王國維，引用《紅樓夢評論》之說不足為奇，但他還懂得以「近日研究紅樓夢」的說法參證元稹自傳之詩，顯示他對蔡元培的索隱紅學和胡適的自敘傳說亦有一定的認識。作為那時候最為前沿的學者，陳寅恪當然知道怎樣從事學界認可的文學研究，深化已有成果。如胡適 1923 年發表〈《西遊記》考證〉反對魯迅有關孫悟空來歷的說法，認

<sup>30</sup>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年），頁 2。

<sup>31</sup> 參胡適：《紅樓夢考證》，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32、465。

<sup>32</sup> 胡適 1961 年 6 月 5 日復李孤帆信，載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10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頁 3626。

<sup>33</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00。

為猴行者應是受到「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Ramayana)」裏的神猴哈奴曼(Hanuman)的影響。<sup>34</sup>陳寅恪在〈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則進一步考查大鬧天宮的由來，認為這段情節乃《大莊嚴經論》等大量漢傳佛經所載的頂生王故事，與「印度最著名之紀事詩羅摩延傳」中的「工巧猿」故事併合出來的結果，<sup>35</sup>隱然修訂胡適的說法。其後胡適撰〈跋《銷釋真空寶卷》〉再論取經故事，<sup>36</sup>陳寅恪很快致函表示：「大著銷釋真空寶卷跋，考證周密，敬服之至」，<sup>37</sup>並就寶卷避諱問題抒發己見，可見他相當熟悉當時最新的成果。

不過陳寅恪並不滿足於接續已有的研究課題，而是另闢蹊徑，結合自己對古今學術的理解，發展出獨特的文史互證研究。他雖然精通胡適所強調的作者、版本等文獻考訂之法，卻沒有完全排斥蔡元培那類情節本事索隱。蔡氏的方法淵源自傳統學術，尤其深受《詩經》學以本事釋詩，<sup>38</sup>以及小說與稗史同源等觀念的影響，<sup>39</sup>每以《紅樓夢》的角色性格和情節描述為線索，推尋小說背後隱藏的歷史本事。<sup>40</sup>胡適雖以科學考證之名大力批判蔡氏的研讀，但陳寅恪對這類植根於傳統的索隱方法顯然抱有較大的同情。他曾在〈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考釋〈辛公平上仙〉的歷史本事，認為該傳奇乃影射唐憲宗被宦官所弑之事。<sup>41</sup>與索隱紅學相比，陳寅恪的論述自然較具說服力，但其方法在本質上與蔡元培並沒有太大差別。

蔡元培因見《紅樓夢》首回曰：「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與崇禎甲申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攻陷京城、明帝自縊之事相對應，推斷該書「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偽統」。<sup>42</sup>陳寅恪則根據〈辛公平上仙〉所記時間(元和末)、地點(光範門、宣正殿等)和人物關係(大將軍、吏、攀髯之泣等)，斷言文中被弑之人君就是憲宗。不過要留意的是，〈辛公平上仙〉原文並無提及宦官的角色，而《順

<sup>34</sup> 胡適：〈《西遊記》考證〉，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冊，頁512。

<sup>35</sup>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17-223。

<sup>36</sup> 文章於1931年3月15日寫成，見胡適：《序跋集》，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99-50。

<sup>37</sup> 陳寅恪：《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38-139。

<sup>38</sup> 如顧頡剛在1922年致胡適函已指出：「實在蔡先生這種見解是漢以來的經學家給與他的」，並且特別提到《詩經》詮釋的影響：「講《詩經》的，好詩可為刺詩，男女可為君臣，講《紅樓夢》亦何嘗不可男變為女，家事變為政事」。見《胡適日記》，1922年3月13日，見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7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539-540。

<sup>39</sup> 參陳廣宏：〈小說家出於稗官說新考〉，見《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9-38。

<sup>40</sup> 關於索隱紅學在20世紀的發展，可參看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44-230；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179-241；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15-127、338-341、599-612等。

<sup>41</sup> 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金明館叢稿二編》，頁81-88。

<sup>42</sup>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頁2。

宗實錄》等相關史料亦與憲宗事無關，只能說明唐代中葉以後宦官黨爭對皇位繼承的支配性影響，所以陳寅恪必須通過連類想像，把二者聯繫起來，始能得出「及憲宗又為內官所弑，闖人更隱諱其事」此一結論。<sup>43</sup>陳寅恪的推論是否嚴密、結論是否穩當、與蔡氏索隱研究有何異同，並非本文討論的範圍。這裏想要指出的是，他的方法貫穿歷史與文學兩個領域，正可調和蔡、胡以來文學研究中文獻考證與文本索隱兩種衝突的取向，實在有著非比尋常的價值。陳寅恪把傳奇與史書捉置一處，令二者得以互相發明，共同證立一個觀點，這是文史互證最為標準的型態。然而在這個互證過程中，文學與歷史究竟處於甚麼關係？過去學者對此有不盡相同的理解，眾說紛紜。

前面提到許冠三和李玉梅均相信陳寅恪箋詩只是為了化詩詞為研究歷史的材料，詩詞本身並不是研究的重點。不過許氏又認為詩文互證可分為「以史傳箋證詩文」和「以詩證史」兩類，並指出前者的數量遠較後者為多。<sup>44</sup>胡守為亦同意陳寅恪「以詩文證史，詩史互證，著眼點不在詩文而在歷史」，<sup>45</sup>卻同樣把文史互證分為兩類：

先生倡導的詩文證史包括二個方面：一是以詩文為史料，或補正史乘，或別備異說，或互相證發；另一種方法是以史釋詩，通解詩意。<sup>46</sup>

按照許、胡的二分法，文史互證中歷史並非一面倒地佔有主導的位置，若「以詩文為史料」，詩固然只是補正史乘的手段，但「以史釋詩」時，歷史便會反過來成為詮釋詩意的材料了。二人無視自己的分類，堅稱陳氏研究重點不在詩文本身，恐怕也是為了迴避錢鍾書的指控，結果令自身的論述左支右絀，出現不必要矛盾。郝潤華引述胡守為的意見後，批評這種二分法並不確切：

應該說，陳氏的詩史互證不是一種學術的兩種研究方法，而是一種方法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互為一體的。說詩與考史同步完成，不分先後，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詩史相融。<sup>47</sup>

<sup>43</sup> 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88。

<sup>44</sup>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頁 244。

<sup>45</sup> 胡守為：〈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見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07。

<sup>46</sup> 胡守為：〈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見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106。

<sup>47</sup> 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頁 117。

並引周勛初的意見佐證其說。陳建華則折衷兩種意見，既承認陳寅恪「一方面以詩為史料而補證史乘，另一方面以史釋詩，通解詩意，且兩者互為一體，相得益彰」，表面看來與周、郝看似同調，但他同時指出從《元白詩箋證稿》、《再生緣》到後期的《柳如是別傳》之間有一個從「以詩證史」到「以史證詩」的過程，<sup>48</sup>隱然又與許、胡的二分法相合，把陳氏兩種取向視為前後期的變化。

種種說法令人眼花撩亂，顯示學界對文史互證最基本的性質仍然缺乏最起碼的共識。各人的說法均以陳寅恪的著述為根據，堪稱持之有故，造成上述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歸納的範圍並不一致，有的針對單一文章而發，有的從整本專書著眼，亦有從宏觀的角度檢閱陳氏的著作目錄；此外各人考察的重點亦不相同，以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假如認真審視他們立論的前提，可以看到上述意見都有一定的根據，只是未夠全面或深入而已。參考過他們的說法後，以下試從書寫動機（作者）、著作主題（文本），以及著作實際呈現出來的詮釋效果（讀者）三個方面，檢討文史互證中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

### 三、文學與歷史的主從關係

不少學者都會以陳寅恪的寫作動機為依據，判斷文學與歷史的位置。如許冠三倡言陳寅恪箋詩只是為了考史，原因是他在著述中「一再表明這一宗旨。例如，撰〈讀秦婦吟〉，是供『治唐五代史者之參究』。作〈桃花源記旁證〉，是由於他相信，此記亦有可信的史料在。寫〈讀鶯鶯傳〉，是因為他以為，是傳雖是小說，同時『亦是貞元朝的良史料』，其他如箋證白居易詩，乃要證明其樂府足當「詩史」之稱，《論再生緣》及錢柳因緣詩的釋證則是要借箋證留存一己之「心史」。<sup>49</sup>這番議論看似有理，實際上卻有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之弊。許氏說陳寅恪箋詩旨在留存「心史」，固然需要更多文獻證據支持，就是他所引用的兩句原文，亦有可商榷之處。他引〈讀秦婦吟〉所謂「治唐五代史者之參究」一語，此句無論是早期發表在《清華學報》的版本還是後來刊行的文集本，均作「以待治唐五代文學史者之參究」。<sup>50</sup>許氏無視「文學」二字，到底是因為先入為主，只看到陳著中有利己見的語句，還是刻意刪改文字，現在已無從稽核，但可肯定的是他徵引〈讀鶯鶯傳〉那句「亦是貞元朝的良史料」也有同樣的問題。該句原作「此傳亦是貞元朝之良史料，不僅

<sup>48</sup> 陳建華：〈從「以詩證史」到「以史證詩」——讀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札記〉，頁 74-82。

<sup>49</sup>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頁 252-253。

<sup>50</sup> 參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1936 年 10 月），頁 968。

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sup>51</sup>從沒有忽略小說的成份，此外文中多次論及「此傳之文詞」、「以古文試作小說」、「感人之程度」等文學問題，<sup>52</sup>許冠三卻視而不同，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假如能夠撇下橫梗於胸的成見，不難發現陳寅恪經常表示他的著作可供文學研究者參考。除〈讀秦婦吟〉和〈讀鶯鶯傳〉外，前面論及陳氏心中的隱含讀者時所引述的「供治小說考證者採覓」、「或亦可為治中國小說者之一助」、「以待研治明季文學史者之論定」等多條材料，都是明顯的例子。不過以陳寅恪的寫作動機判斷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隱含一個很大的限制，因為並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可以找到作者直接的陳述，讀者很多時只能按照個人對陳著的解會揣摩其意，因此很容易流為主觀的猜想，像心史一類說法明顯就是見仁見智的論述。論者固然可以從《論再生緣》或《柳如是別傳》的某些段落中，讀出陳寅恪寄寓的心史或微言，但也可以根據陳氏「著書唯剩頌紅妝」，<sup>53</sup>或是「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等話，<sup>54</sup>申述其寫作動機。兩種說法各有根據，卻會推導出不同的結論。

除了資料不全及多有臆測外，以動機立說的另一個重要局限是，陳寅恪本人在不同地方對寫作的目的或有不盡一致的說法。以元白詩箋釋為例，他最初發表〈長恨歌箋證〉開宗明義即謂要瞭解此詩，須知「當時文體之關係」和「當時文人之關係」，然後詳述小說與古文同源、〈長恨歌〉與〈傳〉文的關係，以及元、白「互事觀摩，爭求超越」的現象，並謂「世之治文學史者可無疑矣」，<sup>55</sup>點明該文與文學研究的關係。可是他在1944年致陳槃的信中卻說：「弟近草成一書，名曰『元白詩箋證』，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非敢說詩也」。<sup>56</sup>我們應該信從他在學術論文中的表述，還是書信往還中的謙語？到了1950年代，陳寅恪為中山大學諸生講授「元白詩證史」，唐筭錄下他當時的話：「元白詩證史即是利用中國詩之特點來研究歷史的方法」，<sup>57</sup>似與文學無關，但劉隆凱的筆記卻說「此課屬歷史學範圍，不多涉及文學，不過有時也要提到文學方面的內容」，<sup>58</sup>這樣又不能說與文學毫無瓜葛了。這類模稜兩可的情況正可說明動機說的不足。

訴諸陳寅恪的寫作意圖並不能圓滿地解答文學與歷史的主從問題，但審視相關的材料

<sup>5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20。

<sup>5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7-119。

<sup>53</sup> 參陳寅恪：《詩集附唐貫詩存》（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37；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981-982。

<sup>54</sup> 陳寅恪1957年〈致劉銘恕函〉，見陳寅恪：《書信集》，頁279。

<sup>55</sup> 陳寅恪：〈長恨歌箋證（元白詩箋證稿之一）〉，《清華學報》第14卷第1期（1947年10月），頁1-9。

<sup>56</sup> 陳寅恪：〈致陳槃〉，《書信集》，頁231。

<sup>57</sup> 陳寅恪：《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484。

<sup>58</sup> 劉隆凱整理：《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3。

後，至少可以看到他一直強調自己的研究與治文學史者有關，並非如後世學者所描述那樣純屬歷史學家考史之作。由是看來，把文史互證分為「以詩證史」和「以史箋詩」兩個方面，似乎是較為穩當的做法。翻閱陳寅恪的著述，不難看到他的文章或專書主題的確有這兩個不同的側重點。許冠三和胡守為正是根據著作主題提出二分之說，前者云：

以史傳箋證詩文的，有〈桃花源記旁證〉、〈讀秦婦吟〉、〈讀哀江南賦〉、〈讀東城老父傳〉、〈讀鶯鶯傳〉和以〈長恨歌箋證〉為主力的《元白詩箋證稿》。以詩證史的專文，僅得〈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和〈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兩篇。<sup>59</sup>

以史傳箋證詩文，自然是以詩文為目的，以史傳為箋證的手段了，假如陳寅恪箋釋後不能增進讀者對那些詩文的認識，他的文章便不能算是成功；反過來說，以詩證史乃要借助詩歌印證歷史，加深我們對史實的理解。以史傳箋證詩文的例子包括〈桃花源記旁證〉與〈讀東城老父傳〉，前者據晉代宗族鄉黨屯聚堡塢等史實，說明「陶公之作桃花源記，殆取桃花源事與劉麟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sup>60</sup>令人知道〈桃花源記〉「亦紀實之文」；後者則引用唐代士兵及胡人服裝等材料，解決傳文難以索解的句子。以詩證史則只有兩篇文章，〈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開篇表明該文是要以杜詩補證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到「雜種胡即九姓胡」此一論點，<sup>61</sup>而〈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則是透過比對元、白詩中所載俸錢之數與各種史料的出入，「推知唐代中晚以後，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於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sup>62</sup>這些都是利用詩歌考證史實之例。

「以詩證史」和「以史箋詩」二分之說，顯然比「純考史」說更符合陳寅恪自述的寫作動機，而且二分說以各種著述文本為依據，自然較猜測作者心理意圖的做法更為客觀、優勝。不過尋繹陳氏遺書，以篇章著作為單位的二分法仍稍嫌機械化，不見得能完整地描述陳氏諸作中文學與歷史的複雜關係。在〈讀東城老父傳〉、〈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類篇幅較短的文章中，二分法的問題並不是很明顯。可是像前文提到的〈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便很難說是以詩證史還是以史箋詩之作了，因為文中涉及的史傳材料與傳奇故事皆各有所偏，二者必須同時並列，互相依存，始能共同證立相關的歷史事件和傳奇本事。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與歷史都是同等重要，難有主從之別。除此之外，像〈讀哀江南

<sup>59</sup>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頁244。按：引文省去許氏以括號標出的著作年分及其他標題。

<sup>60</sup>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讀東城老父傳〉，《金明館叢稿初編》，頁188-201、333-343。

<sup>61</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16，以及〈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金明館叢稿二編》，頁58。

<sup>62</sup> 陳寅恪：〈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76。

賦〉〈桃花源記旁證〉一類順隨原文穿插不同考證的文章，亦很難簡單地作出劃一的概括、歸類。〈讀哀江南賦〉考釋賦文古典今典，固然能夠深化讀者對原文的解會，屬以史證詩之作，但陳寅恪在文中引用《北史·王褒傳》「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等話後表示：

史所謂「褒等」自指子山之流。今庾子山集肆如別周尚書弘正，送別周尚書弘正二首，重別周尚書二首等詩，俱可據以證知也。<sup>63</sup>

這卻是以庾詩證《北史》了。當然，我們仍可辯解說〈讀哀江南賦〉雖有一些地方以詩證史，但整篇文章還是以詩文箋釋為主，所以仍是「以史證詩」之作。不過所謂多與少並無明顯界線，亦非經由統計之後得出的量化描述，論者很多時只是根據自己的印象立說。如許冠三認為〈桃花源記旁證〉、〈讀鶯鶯傳〉是以史證詩的例子，但胡守為卻覺得這兩篇文章是「以小說證史」，<sup>64</sup>乃「以《桃花源記》釋十六國時北方的塢壁經濟形式；從《鶯鶯傳》了解中唐以後社會門第觀念和道德觀念等等」，<sup>65</sup>結果與動機說一樣出現各說各話的情況。這個問題在《元白詩箋證》和《柳如是別傳》兩部篇幅較長的著作中尤其容易看到。

不過話說回來，以著作的主題分析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雖然仍未夠全面，但與動機說相比，已有很大的躍進。陳寅恪自述的寫作意圖只能讓我們確定他的著述並非純屬歷史考釋，不能僅僅限制在史學專業之內，但審視其著述的主題，卻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明白文史互證可以細分為以詩證史、以史證詩以至詩史共證幾類，儘管這些分類並無清晰的界線，主要依賴研究者對相關主題的理解。這種現象正可說明研究者對陳寅恪著作的解讀，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們對文學與歷史關係的想法。假如繼續往詮釋的向度深化，把視線聚焦在文學與歷史在互證過程中實際呈現出來的詮釋效果，不難發現二者實有往復回環的密切關係：史料能印證詩文，被印證的詩文同時又印證著史料，反之亦然。就像周勛初所說：「這樣說詩，有益於考史，而考史的結果，又有益於說詩。這樣的文史研究，如水乳之交融」。<sup>66</sup>

純從主題著眼，陳寅恪的文章或許有不同的側重點，可以區分出以詩證史、以史證詩等取向，但在具體文句的箋釋中，詩與史的關係便難以截然分開了。且不提那些篇幅繁富、

<sup>63</sup>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38。

<sup>64</sup> 蔡鴻生在《〈讀鶯鶯傳〉解讀》中對陳文有精細的分析，同樣強調該文的主旨「不在藝術鑑賞，而在歷史分析」，見《中西學術名篇精讀：陳寅恪卷》（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頁 14。按：蔡文乃其中一位審查人提示參考，特此致謝。

<sup>65</sup> 胡守為：〈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頁 107。

<sup>66</sup> 周勛初：〈以詩證史的範例——讀陳寅恪《韋莊秦婦吟校箋》〉，見《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82。

考釋零散的著述，縱是字數不多、主題較為鮮明的文章，文學與歷史也不見得真有明顯的主從之別。如〈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般被視為以詩證史之作，因陳寅恪在文中先引述舊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材料，以及新、舊《唐書》的說法，重申「雜種胡即中亞昭武九姓胡」，然後引用杜詩中涉及「雜種」、「雜虜」的四首詩，以為「可與此互相發明」。<sup>67</sup>從寫作動機、文章立意以至材料鋪排等各方面看，杜詩都是為了補充說明唐史「雜種胡」之說。不過就詮釋效果而論，杜詩固然印證了唐史，但唐史的「雜種胡」又何嘗不是反過來箋釋了杜詩「雜種」之說？這種論調看似弔詭，其實不難理解。須知歷代注家對杜詩的「雜種」本有不同解釋，如仇兆鰲注「蠻夷雜種錯相干」曰：「雜種，指吐蕃、回鶻、黨羌言」，<sup>68</sup>浦起龍注「雜種抵京室」則謂「雜種，指回紇，舊注非」，<sup>69</sup>今人謝思煒則謂「雜種」泛指蠻夷，「雜種胡」很可能只是臨時的詞語組合，「非某一族之特指」。<sup>70</sup>杜詩「雜種」之義並無定論，陳寅恪卻以「雜種胡」為專名，特指九姓胡，並把杜甫四首詩中三處「雜種」和一處「雜虜」都當作同義的用語，他對杜詩中有關字詞的解讀與前人不盡一致，所以就詮釋效果而言，他的文章同時也是在箋釋杜詩，對原詩字詞作出有別於他人的解讀。

文史互證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所展現的文學與歷史互相詮釋的狀態，與「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揭示的局部與全體的關係正相符合。眾所周知，伽達默爾（H.G. Gadamer）繼承和發展了施萊爾馬赫和海德格爾的說法，把「詮釋學循環」提升至普遍的本體論層次，<sup>71</sup>但較易為人忽略的是，這個觀念最初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主要針對語言文本的理解。德國語文學家弗里德里希·阿斯特（Friedrich Ast）很早已提到詮釋的循環：「對於用陌生形式〔語言〕撰寫的陌生著作的一切理解和解釋不僅以對個別部分的理解為前提，而且也以對這個陌生世界的整體的理解為前提」。<sup>72</sup>陳寅恪文史互證之作包含了文學與歷史的材料，這些材料的鋪排雖有先後或主從之別，但讀者理解相關段落時，都會同時對那些文學作品和歷史材料加深了認識，以杜詩證史固然如此，以史料證其他詩文亦是一樣。〈讀東城老父傳〉有「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之句，而未嘗明言白衫與

<sup>67</sup> 陳寅恪：〈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58。

<sup>68</sup>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625。

<sup>69</sup>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51。

<sup>70</sup> 謝思煒：〈「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歷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2015 年 2 月），頁 172。

<sup>71</sup>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190-193, 265-267. 中譯本參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年），頁 246-248、343-346。

<sup>72</sup> 參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年），頁 4，以及 Ronald Bontekoe. *Dimensions of the Hermeneutic Circl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6), pp. 16-22.

兵士的關係，陳寅恪於是案曰：「老人意謂昔時兵少，而今日兵多。蓋平民衣白，而兵士衣皂故也」，<sup>73</sup>並引《舊唐書》、《通典》、《唐會要》、《唐語林》證當時士卒服飾。唐史材料令讀者明白傳文涵義，但傳文亦印證了各種史料的真確性，所以陳寅恪也承認史傳所載兵額統計之數，「可與老人之言參證」，<sup>74</sup>文學與歷史迴環互釋，密不可分。

#### 四、作為歷史存有的文學文本

上文的梳理基本上展示出不同學者立論的前設，以及各種說法的盲點與洞見。訴諸寫作動機和論文主題，並不能有效說明文史互證中文學與歷史的定位問題，只會引發各式各樣的分歧，惟有從詮釋的過程和效果著眼，始可以對文學與歷史的關係作出較為普遍和確切的描述。陳寅恪把文學與歷史捉置一處，彼此釋證，原因是他相信文學作品是一種歷史存有（historical entities），與它最初出現的時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裏所謂歷史存有的具體意涵，可以從陳寅恪對唐代古文運動的論述中看出端倪。

在〈韓愈與唐代小說〉中，陳寅恪把古文與小說聯繫起來，認為貞元、元和為「古文之黃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係」，其〈毛穎傳〉正是「以古文為小說之一種嘗試」。<sup>75</sup>其後他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說：

又近日論文者有以唐代貞元、元和古文運動乃遠承北朝蘇綽摹倣古體之遺風者，鄙意其說甚與事實不合。蓋唐代貞元、元和古文運動由於天寶亂後居留南方之文士對於當時政教之反動及民間俗體文之薰習，取古文之體，以試作小說，而卒底於成功者。<sup>76</sup>

他雖自言這段話的意思已見於早前論韓愈與唐代小說的舊文，然而細讀兩篇文章，後期的論述無疑有更大的進步，蘊藏許多富有新意的重要訊息。〈韓愈與唐代小說〉主要從「以文為戲」入手，說明古文對小說傳播的影響，這裏卻反過來說古文運動乃因試作小說而成功，當中的因果關係已有微妙的變化。到了《元白詩箋證稿》，古文與小說的關係出現更為完整的表述：

<sup>73</sup> 陳寅恪：〈讀東城老父傳〉，《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34。

<sup>74</sup> 陳寅恪：〈讀東城老父傳〉，《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336。

<sup>75</sup> 陳寅恪：《講義及雜稿》，頁 441、443。

<sup>76</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05。

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於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關係，自來未有論及之者。

77

是故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復更輾轉為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制也。<sup>78</sup>

除小說與古文同源外，當時其他文類如白居易的新樂府，「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也與古文運動相一致：

樂天之作新樂府，實擴充當時之古文運動，而推及之於詩歌，斯本為自然之發展。……而白樂天之新樂府，亦是以樂府古詩之體，改良當時民俗傳誦之文學，正同於以「古文」試作小說之旨意及方法。<sup>79</sup>

元白的新樂府運動並非孤立地出現，二人的文章也有復古的取向：「當時致力古文，而思有所變革者，並不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當日主張復古之健者」；<sup>80</sup>陳寅恪甚至據《舊唐書》的評論，指出「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柳」，<sup>81</sup>可知貞元、元和時的小說、新樂府詩與古文實是互有關聯的文學風潮。

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還提到當時詩文不約而同出現變化，乃因「天寶亂後居留南方之文士對於當時政教之反動」。他論白居易新樂府諸作時，對這一點尤有詳細的發揮：

蓋古文運動之初起，由於蕭穎士李華獨孤及之倡導與梁肅之發揚。此諸公者，皆身經天寶之亂離，而流寓於南土，其發思古之情，懷撥亂之旨，乃安史變叛刺激之反應也。唐代當時之人既視安史之變叛，為戎狄之亂華，不僅同於地方藩鎮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論，成為古文運動之一要點矣。<sup>82</sup>

這裏僅謂古文運動早期作家受安史之亂「刺激」，故以尊王攘夷為思想要點，在後期的〈論

<sup>77</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2。

<sup>78</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4。

<sup>79</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25-126。

<sup>80</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7。

<sup>8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17。

<sup>8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49-150。

韓愈)一文則索性說古文運動是實由安史之亂所「引起」:

今所欲論者，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所引起。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sup>83</sup>

至此安史之亂已成為古文運動出現之原因，而尊王攘夷亦由「要點」變成了「中心」，影響遍及當時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因此陳寅恪相信「古文運動為唐代政治社會上一大事，不獨有關於文學」。<sup>84</sup>

把陳寅恪不同年代和著述中的相關論述統整起來，可以看到他如何把古文運動安置在一個極為複雜的時空網絡關係中，分析這個歷史存有出現的原因和特質。他思考的角度涉及當時整個文化圖像，其中尤以政治環境（安史之亂、藩鎮割據）、民間風俗（民間俗體文、民俗傳誦之文學）和思潮風氣（撥亂之旨、尊王攘夷）三個因素較為重要。政治環境對人民的影響不言而喻，陳寅恪討論文學時經常提到這項要素，除前述安史之亂外，他也屢言科舉制度與文學的密切關係，如唐代貢舉「大要可分為進士及明經二科。進士科主詞，高宗、武后以後之新學也」，<sup>85</sup>「唐代進士科，為浮薄放蕩之徒所歸聚，與倡伎文學殊有關聯」。<sup>86</sup>科舉不但與文體興起、文學題材有關，同時構成文人的知識結構：「唐世選人必深注意其近年考試之題目，以供揣摩練習」，<sup>87</sup>因此白居易應知道修治昆明池一事。至於那些以寫實為務的作品，政治更是不可或缺的素材。陳寅恪認為《舊唐書》卷一論高祖、卷一百二十七論彭偃所論僧尼問題，「乃佛教在唐代唯一政治社會大問題」，韓愈「齊人逃賦役，高士著幽禪」正是這類情況的描述。<sup>88</sup>此外，「唐迴紇在和平時之關係中，馬價為國家財政之一大問題」，<sup>89</sup>這些現象自然亦反映在白居易新樂府中。

與政治同樣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風俗習慣，後者構成人們生活世界（der Lebenswelt）的直接經驗，很容易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如白居易〈井底引銀瓶〉小序云「止淫奔也」，陳寅恪指出白詩所詠「皆貞元元和間政治社會之現象」，「夫『始亂終棄』，乃當時社會男

<sup>83</sup>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頁329。

<sup>84</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50。

<sup>85</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272。

<sup>8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89。

<sup>87</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93。

<sup>88</sup> 陳寅恪：《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7、185。

<sup>89</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351。

女間習見之現相」，元稹〈鶯鶯傳〉也是「最佳之例證」。<sup>90</sup>這種現象與新興起的文詞進士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有關，洪邁懷疑〈長恨歌〉所述，以為白居易「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中夕方去」，抵觸法禁，那是以宋代的男女禮法加諸唐代，不瞭解唐代士大夫風習所致。<sup>91</sup>同樣，今天看似迷信怪誕的事，古人未必作如觀。白居易〈古冢狐〉「以妖狐幻化美女迷惑行人為言」，似是用寓言故事示戒民間男子，但「唐代社會盛行信奉狐神之俗」，<sup>92</sup>狐能為幻化美女惑人實中唐以來盛傳民間信仰，並非單純的故事。縱是錢謙益〈亡兒壽考壙誌〉述及的先人顯靈之事，雖似荒誕，卻是源自當時「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風氣」，<sup>93</sup>錢氏亦不能免俗而已。禮法信仰不能忽視，小如服飾裝扮也不可以等閒視之，因此那些「長於用繁瑣之詞，描寫某一時代人物妝飾」的作品，「亦可作社會風俗史料讀」。<sup>94</sup>就像元稹詩中述及雙文的衣服和寵物，在玄宗時尚屬「宮禁珍貴希有之物品」，至貞元時已流佈民間，從中已可窺見民俗文化的演變。<sup>95</sup>因此他對婦人時妝由寬大轉向短窄等「時尚變遷」、<sup>96</sup>唐制官服的色樣，<sup>97</sup>以至「舊時婦女化妝美容之術」也有認真的考究。<sup>98</sup>就算是古人的名字別號，「亦可窺見社會風習與時代地域人事之關係，不可以其瑣屑而忽視之也」。<sup>99</sup>正是因為重視生活世界的各種現象，陳寅恪每每不避繁瑣的考據，雖或自嘲「繁瑣冗長，見笑君子」，<sup>100</sup>卻仍理直氣壯地堅持「若讀者譏為過於煩瑣，亦不敢逃罪也」。<sup>101</sup>

至於學術思想雖不如政治、習俗那樣影響遍及社會各個階層，但文學作品的作者大多是知識分子，所以當時的思潮風氣對他們也有特殊的意義，其中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尤其不可忽視。陳寅恪考出陶淵明〈形影神〉乃回應魏晉流行的「自然說」和「名教說」而提出來的的新說，並指出該詩序言所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的「惜生」，「不獨指

<sup>90</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87-288。

<sup>9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3-54。他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亦曾批評梁啟超所撰〈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以今度古，乃「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但這些解釋卻不符合「淵明所生之時代，所出之家世，所遺傳之舊教，所發明之新說」等史實，見《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28。戴燕：〈文史殊途——從梁啟超、陳寅恪的陶淵明論談起〉對二人的分歧有詳細的說明，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86 輯（2007 年 12 月），頁 181-205。

<sup>9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96。

<sup>93</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65。

<sup>94</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6-97。

<sup>9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5。

<sup>9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71。

<sup>97</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60-61。

<sup>98</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72。

<sup>9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01。

<sup>10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頁 1250。

<sup>101</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888-889。

舊日自然說之服食求長生，亦兼謂名教說者孜孜為善」，詩中「神之主張即淵明之創解」，「有別於中散等之舊自然說」的「新自然說」。<sup>102</sup>可見道家思想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內涵，不能隨便望文生義，低估了古代作品內涵的複雜性。此外過去讀者或因見慧思〈誓願文〉有求長生治丹藥事，「似與普通佛教宗旨矛盾」，於是懷疑文章的真實性，但陳寅恪認為這是不知長生治藥乃當時佛教天台宗之說而產生的誤會。<sup>103</sup>同樣，假如不知道佛經流布好「取果報故事與本經有關者，編列於經文之前」，便會忽略〈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序文「乃一變相之冥報傳」，「實考證玄奘取經故事之重要材料」，「即唐三藏取經詩話，銷釋真空寶卷，西遊記等書所從出也」。<sup>104</sup>佛、道而外，傳統儒家經學對知識分子當然也有深遠影響，陳寅恪嘗憶述光緒勝流的學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而「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繫」。<sup>105</sup>這是一代學風牽連到文學以至政治的例子。

## 五、對「通解」的追求與實踐

文學既然難以跟政治、社會、思想等分割開來，彼此環環相扣，讀者若要瞭解文本的意義，自然須對當時整套文化背景有一定的認知，不能孤立地局限在作品自身的文字之內。陳寅恪相信理解有不同的深淺程度，越是能掌握相關的背景知識，越是有深刻透徹的理解，這種信念滲透在他不同年代的著述之中。他早期論隋唐史時，已批評司馬光「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禮制之大源」，<sup>106</sup>並且關注到府兵制的史料「疑滯之義不能通解者殊多」，<sup>107</sup>《鄴侯家傳》所謂「六家共之」之六家也是「最難通解」，<sup>108</sup>就是牛李黨派亦「必於其社會歷史背景求之」，「始可以豁然通解」，<sup>109</sup>反復強調「通解」的重要。與「通解」相對的是不完全的理解甚至誤解，如唐晏不知道《中香奩》序中「大盜入關」實指黃巢陷長安一事，「遂解釋詩旨，多所附會，殊不可信也」。<sup>110</sup>又李德裕是「有唐一代不屬於復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選之書」？這個問題「不可僅以個人之偶然好惡為解釋」，而須求之於

<sup>102</sup> 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21。

<sup>103</sup> 見陳寅恪：〈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2-245。

<sup>104</sup> 見陳寅恪：〈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197-199。

<sup>105</sup> 見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62。

<sup>106</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18。

<sup>107</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137。

<sup>108</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146。

<sup>109</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261。

<sup>110</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282。

他的「家世遺傳」，<sup>111</sup>始能予以解答。

陳寅恪致力尋求「通解」，深信讀者必須對當時的社會文化有一定的認識，始能較為完整而恰當地解讀相關文本。正是基於這種想法，他詮釋元稹和白居易的〈西涼伎〉時既關注詩中涉及的中國與吐蕃的宏觀國際關係，同時亦重點考查元稹和白居易的個人生平經歷。經過一番探究，他斷定元、白〈西涼伎〉皆有為之作，但因白居易對吐蕃侵略有更為切身的體會，所以感慨亦較元稹為深。讀者要是不明白這些歷史背景，便難以透徹理解白詩的旨趣：

故知樂天詩篇感憤之所在，較之微之僅追賦其少時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聞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讀白詩，而不讀唐史者，其瞭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即此可見矣。<sup>112</sup>

他沒有否定一般人也可讀懂白詩，但只讀白詩而不讀唐史，不知道當時社會政治的大環境和作者個人的身世，那麼「其瞭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這不是懂或不懂的問題，而是理解程度的深與淺之別，也就是一般的「瞭解」與豁然「通解」之間的差距。因此他箋釋〈長恨歌〉時首先詰曰：「古今中外之人讀此詩者眾矣，其瞭解程度果何如？」<sup>113</sup>這是從「通解」的高度質疑舊有解讀的水平。

陳寅恪的「通解」觀高度重視作者的時代環境和個人身世，與傳統詩論強調的「知人」、「論世」之說顯然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他本人對此也有一定的自覺：

以是欲瞭解元詩者，依論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與婚姻問題，而欲明當日士大夫階級之仕宦與婚姻問題，則不可不知南北朝以來，至唐高宗武則天時，所發生之統治階級及社會風習之變動。<sup>114</sup>

結合作者生平與時代背景詮釋詩歌，絕對不是陳寅恪的新發明，傳統學者箋詩早已運用這種方法，如馮浩釋李商隱詩時便提出「夫說詩之法，實則徵其蹤跡，虛則領其神情」，並根據集中若干作品的主題和用語，斷定李商隱於大中二年有巴蜀之遊。<sup>115</sup>不過陳寅恪的辨析更為詳細嚴密，考出「大中二年巴蜀遊蹤，實無其事」，那些描述遊歷的詩句「大抵大

<sup>111</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264。

<sup>11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36。

<sup>113</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

<sup>114</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86。

<sup>115</sup> 唐·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 866-867。

中六年夏間奉柳仲郢命迎送杜悰，並承命乘便至江陵路祭李德裕歸柩之所作」。<sup>116</sup>他辨析元白詩中涉及的俸料錢也特別提到「讀詩論世之君子，並取參究」，<sup>117</sup>明確指出文中的辨證有論世之用。不過由於受到現代學術的洗禮，加上個人的博學深思，陳寅恪參閱的史料範圍遠較前人為廣，考釋方法亦更為精密，因而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

通盤檢閱陳寅恪的論述，通解之「通」主要包含兩層的意思，其一是通貫、相通，即把文學與其他史料紀述貫通起來，以達致全面的理解；其二是通達、通曉之意，指文學文本中的文句詞理暢順，無驚扭費解之處。前面提到陳寅恪考〈桃花源記〉和〈辛公平上仙〉背後的歷史本事，便是貫通文學與其他史料的上佳例子。詩歌方面則不妨參看白居易〈司天臺〉「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減中台坼」之句，<sup>118</sup>該詩序言謂此詩旨在「引古以儆今」，陳寅恪於是追溯《晉書》中台等故實，最後考出白居易所譏諷的應是「當時司徒杜佑司空於頤二人之一」，當中又以杜佑的機會較高。<sup>119</sup>他把〈司天臺〉與《晉書》、《周禮》賈疏、《後漢書》以及白居易其他作品貫通起來，令大家對詩中所儆之「今」有更為深入的理解。此外他又嘗以德宗放馴象事釋〈馴犀〉「馴象生還放林邑」、<sup>120</sup>以濫立石碣「社會風氣」事釋〈青石〉「不鐫實錄鐫虛詞」、<sup>121</sup>以嚴礪罪狀釋〈黑龍潭〉「狐假龍神食豚盡」、<sup>122</sup>以《唐會要》釋〈天可度〉序之「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等，<sup>123</sup>這些都是貫通文學與史料的鮮明例子。

陳寅恪晚年箋釋錢柳因緣之詩，仍然相當重視外在背景與詩歌詮釋的關係：

今欲考此次河東君嘉定之遊，所居住遊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陽嘉燧，唐叔達時升，張魯生崇儒，張子石鴻磐，李茂初元芳，孫火東元化諸人居宅或別墅所在，約略推定，然後松圓為河東君此次遊練川所作綺懷諸詩，始能通解也。<sup>124</sup>

若對當時各人住處沒有認識，便不能通解柳如是那次遊歷時所寫的作品。假如作品涉及男女私情，除了要知道「當時通例，名姝適人後，詩文中詞旨過涉親昵者，往往加以刪改」

<sup>116</sup> 陳寅恪：〈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37。

<sup>117</sup> 陳寅恪：〈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65。

<sup>118</sup>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172。《元白詩箋證稿》，頁 184，所引原詩作「耀芒射角動三台」，不知何本。

<sup>119</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85。

<sup>120</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02-204。

<sup>12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27-228。

<sup>12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98。

<sup>123</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99。

<sup>124</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47。

一類風俗世情外，<sup>125</sup>還須對作者不便告人的隱私也有一定的解會，儘管這類解讀或會予人求之過深的感覺。像《牧齋遺事》記錢謙益為門生剖析古書僻事，偶忘「惜惜鹽」之典，柳如是遂從旁提示此乃古樂府歌行體之一種。陳寅恪覺得這則軼事背後其實隱藏著相當複雜微妙的情緒：

世人多喜傳誦此事，以為談助。不知河東君之調牧翁，牧翁遜詞解嘲，兩人之間皆有隱情，不便明言。後之讀牧齋遺事此條者，未必能通解也。<sup>126</sup>

他認為「惜惜鹽」一典在《容齋隨筆》「昔昔鹽」條中早有詳細考辨，博學如錢氏自應知悉，但因錢氏猜想柳如是所讀《容齋隨筆》必是謝三賓、馬元調的刻本，而謝三賓此書又與周延儒有關。錢謙益不回應門生實因謝三賓是他的情敵，而周延儒則是他的政敵，互此關係尷尬，柳如是深明箇中關鍵，「故兩人於此微妙之處，皆心知其意，不肯道破」云云。<sup>127</sup>毋庸諱言，陳寅恪的推論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須知《昔昔鹽》並非僅見於《容齋隨筆》，早在洪邁成書之前，郭茂倩《樂府詩集》已收錄多首《昔昔鹽》體樂府詩，並於「昔昔鹽」題下申明：「隋薛吏部有《昔昔鹽》，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sup>128</sup>並附上相關詩作，此後如《能改齋漫錄》也有論及此典。<sup>129</sup>然則陳寅恪憑甚麼斷定柳如是不是直接從《樂府詩集》或其他地方讀到此一故實，而必須間接地從《容齋隨筆》的考辨中得悉此典？此外陳氏說二人「不肯道破」亦不符合原來記述，柳如是明明直接道出「太史公腹中書乃告窳耶？是出古樂府。惜惜鹽乃歌行體之一耳。鹽宜行，想俗音沿訛也」。<sup>130</sup>假如錢謙益真的像陳寅恪所想那樣，因念及彼此與謝、周二人的關係而不肯道破此典，以聰慧體貼見稱的柳如是又怎可能如此不知好歹，當面說穿？反復研讀陳寅恪的論述，仍然令人覺得錢謙益那種複雜微妙的感情似乎僅屬陳氏個人的臆想，未可盡信，但無論如何，這些嶄新見解都是他貫通各種史料後得來的結果，反映了他如何竭力追尋一般解讀之外的通解。

通解的另一層涵義是要令文本的字句通達明瞭，沒有費解之處。《隋書·食貨志》有「是後夏人半為兵矣」一語，陳寅恪先引「岡崎教授於其所著論文之第陸頁第柒行引隋書食貨志及通典此條俱少一『夏』字，豈別有善本依據耶？抑以其為不可解之故，遂認為衍

<sup>125</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441。

<sup>126</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218。

<sup>12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220。

<sup>128</sup>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 1109。

<sup>129</sup> 參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黃帝炎曲炎當作鹽」條，頁 571。

<sup>13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218。

文而刪之耶？」<sup>131</sup>不過他認為「夏」字必非誤衍，應指「此時以前之府兵既皆是胡姓，則胡人也，百姓，則夏人也」，並且相信「若不依鄙意解釋恐不易通」。<sup>132</sup>「夏」字在原文脈絡中意思不明，以致有學者索性把它刪去，但陳寅恪卻以為這是增編非胡人的百姓為府兵之意，並且相信只有依據他的解釋，才能疏通文義。此外錢謙益〈半塘雪中戲成次東坡韻〉其二有「方璧玄珪密又織」句，陳寅恪謂此句當本於謝惠連《雪賦》「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但錢詩何以作「方璧玄珪」而非「方珪圓璧」：

但牧齋詩語殊難通解。豈由尚書禹貢有「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及此首第柒句「高山歲晚偏頭白」，用劉禹錫詩「雪裡高山頭白早」語，因而牽混，誤「圓」為「玄」。並仿文選陸江文通「別賦」，「心折骨驚」之例，造成此句耶？<sup>133</sup>

他博引經籍文例，正是要令這個難以索解的詞語組合得到妥善的解釋，這是通解的另一重要要求。當然，文本內部意義的通達與文本外在材料的貫通並非互不相干、截然對立的項目。陳寅恪分析了錢氏寫成「方璧玄珪」的用心後，進而估計錢謙益寫此詩時或因想到「己身與周延儒之關係」，故此「賦詩之時，心情激動，遂致成此難解之句歟？」<sup>134</sup>這是以作者身世佐證詩句文義，二者相輔相成，並無衝突。不過要重申的是，通解的兩層意義雖然關係密切，在觀念上仍然各有專屬，不宜相混。

通解是非常高的詮釋要求，假如文本與史料未能貫通，亦不必強作解人，刻意求通。陳寅恪釋〈驃國樂〉時注意到「驃國王所遣之使，諸書所記互相乖異」，白居易樂府詩及〈與驃國王雍羌〉均稱使者是舒難陀，《通鑑》的記述則是悉利夷。面對這種情況，陳寅恪的態度相當謹慎：

唐頌白書俱當時之文件，其他諸書亦皆可信之史籍，而抵牾若此，殊不可解。姑記之以俟更考。<sup>135</sup>

其他如《國史補》有關霓裳羽衣曲的記錄與白居易的描述也不相合，陳寅恪只能承認此處「殊不可解，姑記此疑，以俟詳考」，<sup>136</sup>沒有勉強解釋。他曾憶述光緒年間已習誦〈圓圓

<sup>131</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151。

<sup>132</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 151。

<sup>133</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772。

<sup>134</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772。

<sup>13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16。

<sup>13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31。

曲)，經歷了「六十餘載之久，猶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讀書之難若此」。<sup>137</sup>比〈圓圓曲〉更膾炙人口的〈長恨歌〉，古今讀者雖多，但「其詮釋此詩形諸著述者，以寅恪之淺陋，尚未見有切當之作」，<sup>138</sup>言下之意是他認為過去無人能通解此詩。讀書解詩如此之難，難怪當他自信鑿破鴻濛，釋讀出錢謙益「早梅半面留殘臘，新柳全身耐曉寒」之意，也難掩得意之情：「幸得高才，知實事而能賦詠之矣，然數百年之後，大九州之間，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復有幾人哉？更復有幾人哉？」<sup>139</sup>他相信自己能通解其旨，然則通解雖然極難做到，卻也不是永遠無法企及的虛幻境界。

## 六、文學審美須以通解為根據

錢鍾書借用韋勒克（Rene Wellek）“The 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ry Scholarship” 一文的用語，把陳寅恪視為「實證主義」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按照韋氏的說法，19世紀下半葉的實證主義並不專指遵從孔德（Comte）、斯賓塞（Spencer）學說的人，而是包括那些僅僅堆疊沒有關係的事實，以及假設文學應該用自然科學方法來說明的文學研究，諸如因果關係及泰納（Taine）所強調的種族、環境、時機等說法。<sup>140</sup>然而根據上文的論述，陳寅恪耗費心力廣搜史料，並不是為了提出單一的科學概念或因果規則解釋文學，而是希望「通解」作為歷史存有的文本之涵義。因此把陳寅恪的文學研究與實證主義等同起來，實在並不公允。當然，韋勒克還提到20世紀初幾類反傳統的文學研究中有一種尚古學風（antiquarianism），仍然致力收集孤立的事實，迷糊地相信這些一磚一瓦在學問的金字塔中總有派上用場的時候。<sup>141</sup>他指出這種「事實主義」（factualism）經常與錯誤和有害的「歷史主義」（a false and pernicious “historism”）連結起來，不但排距文學的分析和批評，還會迴避所有審美問題，結果導致極端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以至價值上的無政府主義（anarchy）。<sup>142</sup>不過韋氏的憂慮並不適用於陳寅恪的文學研究，儘管陳氏的論著表面看來確有濃厚的尚古學風或歷史主義的味道，但最重要的是，陳寅恪從

<sup>13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765。

<sup>138</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2。

<sup>13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574。

<sup>140</sup>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56.

<sup>141</sup>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p.256.

<sup>142</sup>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p.257.

來沒有忽略文學的審美與鑑賞問題。<sup>143</sup>

陳寅恪並不迴避文學文本的分析和批評，他遍考史實，只因他相信文學的鑑賞批評必須建基在可靠的文獻資料及恰當的解釋之上，否則所謂鑑賞評論，只會流為隨意臆測的無根之談。陳衍《宋詩精華錄》嘗評帝羃〈在燕京作〉云：

末五字悽黯。宋諸帝皆能詩，然舍仁宗「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十字，語多陳腐，無能如唐玄宗者。此首可兄事唐文宗之「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殆所謂愁苦易好歟。<sup>144</sup>

這些評論顯得頭頭是道，高明內行，但陳寅恪的批語是：「此詩疑是偽託。若果偽託，則評語殊無謂矣」，<sup>145</sup>陳衍主要圍繞帝王詩作的高下立論，但此詩若非帝羃所撰，這種比較便毫無意義。陳衍又認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乃「言漢帝之猶有眼力，勝於神宗」，<sup>146</sup>而「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是「與我善者為善人意」。<sup>147</sup>陳寅恪卻考出王詩作於嘉祐年間：

其時神宗未為人君，介甫未為相，「低徊」二句何得謂「漢帝之勝於神宗」？「漢恩」二句亦何得有「與我善者為善人」意？故說詩而不攷史，未有不流為臆說者也。神宗生於慶曆八年，介甫作《明妃曲》時在嘉祐四年，神宗年十二歲，英宗尚未繼統，更何可以漢帝比神宗耶？<sup>148</sup>

詩歌既然是一種歷史存有，若不把基本的事實弄清，便難以確切理解文本的意義，遑論評論其好壞。陳寅恪相信基於不準確的事實和解讀而作出的評鑑，不過是「臆說」，甚至是「無謂」的評語。

陳寅恪批評陳衍「說詩而不考史」，他本人釋讀作品自然首重史實的考訂，因此他評論柳如是〈別賦〉時，首先指出：

<sup>143</sup> 項念東便指出陳寅恪的詩歌考據富有詩性眼光，與岑仲勉著重文獻搜集、文本比勘的取向不同。見《20世紀詩學考據學之研究：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155-159。項書用力甚勤，資料豐富，對岑仲勉詩學文獻考據之貢獻尤多抉發整理。按：此書乃其中一位審查人提示參考，特此致謝。

<sup>144</sup>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2。

<sup>145</sup> 張求會輯錄：〈陳寅恪手批《宋詩精華錄》〉，《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30。

<sup>146</sup>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頁127。

<sup>147</sup>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頁129。

<sup>148</sup> 張求會輯錄：〈陳寅恪手批《宋詩精華錄》〉，頁131。

此賦之作成時間及地域並所別之人三事，茲綜合考證之。若所言不誤，則於賦中之辭義，賦主之文心，更能通解欣賞也。<sup>149</sup>

短短幾句已點明，作品的時、地、人等背景資料都是「通解」、「欣賞」作品「辭義」以至作者「文心」的前提，要是認知不足，由此而生的評論當然亦會有問題。他研究柳氏〈洛神賦〉也強調「關於此賦有二問題。（一）此賦實為誰而作？（二）此賦作成在何年？」<sup>150</sup>二者都是文本詮釋最基本的條件。倘若有更深的理解甚或通解，還須要知道當時社會的大環境，譬如要明白元稹的豔詩和悼亡詩，除了要有一般的背景知識，還須明白：

夫此兩類詩本為男女夫婦而作。故於（一）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當日社會中所處之地位。（三）當日風習道德二事影響及於微之之行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後始可瞭解。<sup>151</sup>

他所關注的考釋範圍彷彿如漣漪那樣，由作者涉及的題材逐層擴散至「當日士大夫階級之仕宦與婚姻問題」，以至「南北朝以來，至唐高宗武則天時，所發生之統治階級及社會風習之變動」。<sup>152</sup>對這些資料有足夠的認識後，始可進一步評論文本的高下優劣。

討論至此，有一個問題必須予以澄清。不少學者比較陳寅恪與錢鍾書的批評觀時，都會把前者標籤為「詩史」研究，<sup>153</sup>然後引用錢鍾書對詩史的著名批評，以為下面一番話乃針對陳氏而發：

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sup>154</sup>

<sup>14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328。

<sup>15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36。

<sup>15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85。

<sup>15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86。

<sup>153</sup> 如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頁 48-53；左漢林：〈論陳寅恪與錢鍾書的「詩史」之爭〉，《湖北社會科學》2004 年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頁 51-52。胡曉明：〈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詩與文化心靈》（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45。

<sup>154</sup>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3-4。

這番論述不免令人覺得陳寅恪純粹「單憑內容」的真偽「判斷詩歌的價值」，個別學者甚至倡言錢鍾書所強調的有關文學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在陳寅恪的研究中都是看不見的」。<sup>155</sup>然而必須鄭重指出，這類理解並不合乎事實，陳寅恪提出的通解固然是對文學作品的「闡明」和「分析」，此外他對作家、作品也有許多具體的「評價」，這些評價絕不僅僅以內容是否信而有徵作為判分的標準。他分析〈長恨歌〉時強調瞭解此詩「須知當時文人之關係」，<sup>156</sup>此舉不僅僅是為了知人論世，同時也是要建立鑑賞批評的參照指標。他箋釋〈琵琶引〉時補充說：

寅恪於論長恨歌篇時，曾標舉文人之關係一目。其大旨以為樂天當日之文雄詩傑，各出其作品互事觀摩，各竭其才智競求超勝。<sup>157</sup>

他相信作家創作時總會受到同期作者的影響，互相觀摩，並且竭力超越求勝，因此作品必須安放在合適的時間座標之內，與其他作品對照比較，始能看出當中的優劣得失：

故今世之治文學史者，必就同一性質題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於同中求異，異中見同，為一比較分析之研究，而後文學演化之蹟象，與夫文人才學之高下，始得明瞭。否則模糊影響，任意批評，恐終不能有真知灼見也。<sup>158</sup>

這段話實在非常重要，當中透露了(1)陳寅恪對客觀的文學批評的追求，試圖為文學批評建立分析、比較的準則，排斥那些空泛、任意的判斷；(2)他如何把歷史研究轉化為批評的基礎，由知人論世、「通解」作品旨意等認知層面，進入評斷「文人才學之高下」的鑑賞領域；以及(3)他所理解的實踐批評的具體做法，那就是把性質相同的作品按照時代先後排列起來，分析箇中異同，辨別高下。

陳寅恪強調時序結構與文學評鑑的關係實在饒具理論意義，艾特略(T. S. Eliot)在其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也提到「沒有詩人或任何類別的藝術家具有完全獨立的意義。……你不能單獨地評價他，必須把他安置於那些已逝之人中間加以對照和比較。我視此為美學上的一條原則，而非僅僅是歷史批評」，<sup>159</sup>末句尤其可圈可點，所以我們亦沒有隨便套用「歷史批評」或「歷史主義」一類術語描述陳

<sup>155</sup> 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頁 52。

<sup>15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2。

<sup>157</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6。

<sup>158</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6。

<sup>159</sup> 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p.49.

寅恪的文學研究。此外陳氏強調作家與前人和同詩作者競勝的心理，亦可在布魯姆(Harold Bloom)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得到和應：「大詩人都會堅毅地與前代詩豪奮力搏鬥」(the persistence to wrestle with their strong precursors)，因而產生理想化或極度焦慮等情況。<sup>160</sup>引述現代西方批評家的言論並不是說陳寅恪的意見與他們完全相同，而是要顯示陳氏的文學研究絕非如某些學者所理解般完全缺乏「評價」一環。陳寅恪不但經常評論作品，而且他評論的判準和方法與現代學者關注的問題仍能互相呼應，反映他在文學批評的領域內確然有獨特見解，只要撇下成見，自能發掘當中義蘊。

## 七、時序結構中的鑑賞批評論

詩人都是在特定的時空內從事創作，他們一方面繼承前人遺產，形成自己對詩歌的基本理解，另一方面則力圖突破前人規限，創造個人的風格。陳寅恪評論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時，對這種微妙的張力有頗為詳細的說明：

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詩，則新樂府之體，實為摹擬杜公樂府之作品，自可無疑也。……樂天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即摹毛詩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詩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為其題目，即效關雎為篇名之例。<sup>161</sup>

白居易取法的對象遠紹《詩經》，近承杜甫，聲氣相同的同代詩人則有元稹和李紳。然而白居易並不甘於蹈襲他人舊轍，而是借鑑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有意識地改進文體。李紳、元稹所作新樂府之句律，多以七字句為常則，但白詩「則多以重疊兩三字句，後接以七字句」，<sup>162</sup>這種句式雖然間或見於杜甫等人的舊樂府中，卻不如白詩之常見。陳寅恪相信這與當時敦煌變文常用三三七句之體有關，認為白居易的樂府詩正是當時民間歌謠的改進，與同期的韓愈等人用古文試作小說的實驗正相符合：

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與陳李輩之改革齊梁以來

<sup>160</sup>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

<sup>16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22、124。

<sup>16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25。

士大夫紙上摹寫之詩句為標榜者，大相懸殊。其價值及影響，或更較為高遠也。<sup>163</sup>

他通過與前代及同期詩人作品的比較，突顯出白氏樂府超越他人之處。儘管未必人人同意他的判斷，但無可否認，這些判斷都是建基於嚴謹的史實考訂上，並且有明確的參照標準，與隨意臆測的主觀評論迥然有異。

從理論上說，優劣高下從來都是相對的觀念，只有通過作品與作品之間的比較始能有較為實質的意義。陳寅恪既重視歷時的比較，同時關注共時的分析。歷時的宏觀對照可以揭示作品取材淵源，「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能」；<sup>164</sup>共時的精讀則可縷述作品書寫的特徵，如取性質相近的「兩詩比較分析，其因襲變革之詞句及意旨，固歷歷可睹也」，<sup>165</sup>足以避免「模糊影響，任意批評」之病。除此之外，比較必須有合適的範圍，以語言比較為例，「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否則只是「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以中外文學比較為例，「亦祇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sup>166</sup>因此要作恰當的比較研究，「必具一歷史觀念」：

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sup>167</sup>

當中「歷史演變」與「系統異同」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蓋仿效沿襲即所謂同，改進增創即所謂異」，<sup>168</sup>假如不知道作品的出現先後，便不能斷定誰是沿襲，誰是增創，分辨異同。因此他又提出：

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sup>169</sup>

<sup>163</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25。

<sup>164</sup>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18。

<sup>16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7。

<sup>166</sup>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1-252。

<sup>167</sup>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52。

<sup>168</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

<sup>169</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9。

他相信「樂天當日實已超越微之所作」，<sup>170</sup>這句評語並非泛泛之談，而是比較白居易〈琵琶引〉與元稹〈琵琶歌〉兩首性質相近的詩作後得出來的看法。元詩作於元和五年，白詩作於元和十一年，「元作先而白作後，此樂天得以見元作，而就同一性質題目，加以改進也」。<sup>171</sup>元詩一題而兼二旨，不及白詩一題一旨明白曉暢，這是後起者競勝改進的結果。不過話說回來，後出不一定轉精，李紳〈悲善才〉作於元和十五年，辭旨雖與白詩相類，同表撫今追昔之意，「但若與樂天之作參互並讀，則李詩未能人我雙亡，其意境似嫌稍遜」。<sup>172</sup>李紳既見白詩，卻未能增創造境，超越白氏，二人詩才高下立判，這是「苦教短李伏歌行」其中一個具體而鮮明的例子：

李公垂之心伏白樂天，皆文雄詩傑，歷盡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後之讀者所涉至淺，既不能解，乃妄為品第，何其謬耶！<sup>173</sup>

陳寅恪相信通過這類時代相同、性質相近的作品比較，始能深入作家文心，理解創作甘苦，作出合適的評論，否則只是妄為品第，強作解人。

陳氏所謂「史家長編」式的比較法適用範圍甚廣，小至詩中單詞隻語，大至文體結構佈局，都可從中分出高下。如白詩「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句有多個版本，「冰」或作「水」，「難」或作「灘」，過去段玉裁認為後句本與「花底滑」屬對，所以應作「冰下難」。陳寅恪同意此說，並指出白詩乃從元稹〈琵琶歌〉「冰泉鳴咽流鶯澀」句「演變擴充」而來，<sup>174</sup>而且青出於藍：

又微之詩作「流鶯澀」，而樂天詩作「間關鶯語花底滑」者，蓋白公既擴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澀，未免兩句同說一端，殊嫌重複。白詩以滑與難反對為文，自較元作更精進矣。<sup>175</sup>

他還注意到元稹取材於經史的詩句，造語「頗嫌硬澀未融」，白居易則無此問題，因而強調「白詩即元詩亦李詩之改進作品。是乃比較研究所獲之結論，非漫為軒輊之說也」，<sup>176</sup>重

<sup>170</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7。

<sup>171</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48。

<sup>172</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0-51。

<sup>173</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1。

<sup>174</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5。

<sup>175</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56。

<sup>17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30-131。

申自己對詩文優劣的判斷乃客觀研究的結果，與主觀隨意的評論不同。個別字詞之外，詩歌的排序結構也可從對比之中得到啟發：

微之之作與樂天之作，同一題目，而次序不同。……惟觀微之所作，排列諸題目似無系統意義之可言，而樂天之五十首則殊不然。……其全部組織如是之嚴，用意如是之密，求之於古今文學中，洵不多見。是知白氏新樂府之為文學偉製，而能孤行廣播於古今中外之故，亦在於是也。<sup>177</sup>

白居易的新樂府是否因為詩作之間組織嚴密，因而得以成為文學偉製，以至廣播古今中外，實在難以確定。重要的是，陳寅恪深信比較白詩與李紳、元稹的同類作品，能夠揭櫫白居易獨步古今之處，這是對比研究應用於詩題結構，評斷優劣的例子。

## 八、評鑑架構的概念化：今典與古典

陳寅恪晚年箋證錢、柳因緣詩，雖然自稱「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sup>178</sup>但從書中所見，他並沒有捨棄分析元、白詩時所用的方法。《柳如是別傳》開篇即倡言「寅恪釋證錢柳之詩，於時地人三者考之較詳」，<sup>179</sup>重申詩歌時空座標的作用。此外他亦沿用同代詩人作品之間的比較，品評高下：

牧齋詩第叁第肆句，實寫河東君前夕豪飲，次晨早妝之態。形容巧妙，如見其人。至若孟陽經雲詩第肆首，亦描寫河東君早妝之作。雖與牧齋此兩句之意旨相同，但錢詩造語精煉，非程詩所可及。<sup>180</sup>

這些都是過去用過的「故技」，反映陳寅恪在文學評鑑上已有一套頗為固定的方法。他還把同代作家之間互相觀摩、超越競勝之心理應用在錢、柳身上，藉此分析二人創作時的文心，辨別優劣，如謂：

<sup>177</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 131。

<sup>178</sup> 陳寅恪 1957 年〈致劉銘恕函〉，見陳寅恪：《書信集》，頁 279。

<sup>17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0。

<sup>18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69。

夫牧齋平生不喜作詞，亦不善作詞。然忽於崇禎十三年秋間，連作永遇樂詞四首者，豈當時已見及河東君此詞，遂受其影響，破例為此，以與之競勝耶？<sup>181</sup>

牧齋詩此二句與河東君詩「漢珮敢同神女贈，越歌聊感鄂君舟。」兩句，用典正同，針鋒相對，文情才思，自為精巧。錢遵王不注一字，固以為習用之典，無煩徵引。實不知此等妙處，更須標出，庶幾不負作者之苦心也。<sup>182</sup>

這是錢謙益有意與柳如是競勝之例，此外柳氏亦竭力圖超越錢氏：

蓋河東君為人負氣好勝，其與當時名士拈題鬪韻，往往超越諸人之上……。今觀初學集中所存與牧齋唱和之作，頗多別有意境，非復牧齋所能企及。至其未載者，則屬不能與牧齋競勝之作品。<sup>183</sup>

河東君次韻牧齋詩，全首辭旨皆佳。……鉤心鬪角，各顯所長。但河東君之作，終勝於牧齋。讀者苟取兩人之詩並觀，則知鄙說非重女輕男、阿私所好也。<sup>184</sup>

類似例子散見於全書之中，足證陳寅恪箋釋錢、柳之作雖或有引用新材料，考析時亦或有新方法，但書中評騭文本高下之法，實與他多年的研究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並非毫無依傍的全新試驗。

陳寅恪析論錢謙益〈有美詩〉時亦不諱言方法之所從出：「作者思想詞句之構成，與材料先後次序之關係，可參拙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章七德舞篇所論」。<sup>185</sup>文中所謂「七德舞篇所論」，當指以下說法：

凡詮釋詩句，要在確能舉出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並須說明其所以依據此書，而不依據他書之故。若僅泛泛標舉，則縱能指出最初之出處，或同時之史事，其實無當於第一義諦也。<sup>186</sup>

<sup>181</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343。

<sup>182</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549。

<sup>183</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569。

<sup>184</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585。

<sup>185</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615。

<sup>186</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135。項念東也注意到此段話中「第一義諦」的重要（見《20世紀詩學考據學之研究：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中心》，頁151-154），甚至以此為陳氏「詩學考據之基點」，概括他對詩情、詩心的探尋（頁160-182）。然而項書主要以岑氏的隋唐史研究為參照，較為偏重陳寅恪的唐詩箋釋，不免高估了「第一義諦」在陳氏整體文學批評架構中的位置。事實上，陳氏此段主要針對「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而發，此中所述「出處」與「史事」俱為說明作者所據之「古書」，僅屬《柳如是別傳》所說之「古典」考釋，「即舊籍之出處」部分。因此文中「第一義諦」之論純粹表示古典箋釋的最高要求，不能以此語概括陳氏的今典考釋、古典今情合流，以至時空結構中共時競勝等說法。

「舉出作者所依據以構思之古書」，本是箋釋詩文時常用的典故考釋之法，然而陳寅恪對此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詮釋者能夠說明作者依據此書而非他書的原因，不能「泛泛標舉」。他在〈讀哀江南賦〉中，還把典故分為「古典」、「今典」兩類：

解釋詞句，徵引故實，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sup>187</sup>

古典指詩中的故實典故，即一般所理解的用典；今典則是陳氏的特有用語，專指作者寫作時的時事，所以又稱「今事」，其意與本事相近。

今典、古典這組觀念的出現實有無比尋常的意義，陳寅恪之前箋釋詩文雖然也相當重視典故與時事的關係，卻未能把這種想法提升至觀念的層面，予以系統的論述。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分析白居易〈杏為梁〉便注意到詩中所用古典：「此篇以杏為梁為名篇者，杏梁一詞，乃古詩中所習見」，並舉《玉臺新詠》多首涉及「杏梁」詩篇佐證其說，<sup>188</sup>此外他同時點出「然樂天詩中有『去年』『今歲』之言，自非僅採古典，當亦兼詠近事也。」<sup>189</sup>他雖然知道白詩的古典兼詠近事，語帶相關，並非泛用故實，卻缺乏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申明其說。反觀〈讀哀江南賦〉不僅提出今典、古典二語，還具體闡釋箇中涵義，顯示陳寅恪逐漸有意識地歸納過去研究所用方法的特質。此後〈論再生緣〉亦自覺地運用這組觀念，如謂「若是端生，則佩荃長生諸詩中所用古典皆能適合，自不必贅論，而佩荃『淡妝不逐畫眉新』之句與西冷閨詠壹五繪影閣永家□□詩序中『屏謝膏沐』之今典更相符會也。」<sup>190</sup>到了《柳如是別傳》，陳寅恪更進一步把古典、今典的考釋視為詩歌箋釋的主要任務：

自來註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sup>191</sup>

古典向有用典、用事之分，今典雖然主要指時事，卻同樣可以包括當時文獻。錢謙益有「自有青天如碧海，更教銀漢作紅牆」之句，陳寅恪案曰：

<sup>187</sup>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34。

<sup>188</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282-283。

<sup>189</sup>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頁283。

<sup>190</sup> 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頁25。

<sup>191</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7。

三四兩句遵王已引其古典。至其今典，則第叁句可與牧齋永遇樂「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韻」詞「嫦娥孤另」，而第肆句可與此詞「銀漢紅牆」及河東君次韻答牧翁冬日泛舟詩「莫為盧家怨銀漢」等參證。<sup>192</sup>

同時期的詩作能夠互文見義，有助理解原詩，因此也是今典的一種。

陳寅恪用古典、今典這對概念標示詩文詮釋的要素，考證這兩種典故既有助通解詩歌文本，自亦能為鑑賞批評的奠下基礎。〈讀哀江南賦〉言：

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sup>193</sup>

按照陳氏的意思，作者能融會古今情事，貼切地運用古典描寫今事，營造今古合流之境，已臻文章之極詣。換句話說，考釋今典、古典既能闡明文本的詞義和本事，亦能為作品評鑑提供判別優劣的基本準則。對追求「通解」的陳寅恪而言，這是自然不過的道理，因為要是不知道今、古典的含義，又怎能確定詩中所述「古事」與「今情」融合無間，從而分辨作品高下？他對這條審美原則極為重視，兼且相當自信。其〈論再生緣〉謂「人在蓬山快欲仙」句，「『蓬山』蓋兼指登州府蓬萊縣。古典今事合為一詞，端生才華於此可見一斑也」；<sup>194</sup>復指出「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乃借用〈哀江南賦〉「天道周星，物極不反」之語而賦以己意，因而評曰：

古典今情合為一語，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於子山之文，深有解會，即此可見。寅恪讀再生緣，自謂頗能識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虛詞讚美也。<sup>195</sup>

陳寅恪正是通過今典、古典的細緻考釋，窺測作者創作時的用心，從而發現揉合二者的巧妙文思。這類通過審慎考證和細緻比較而得出來的讚美，自非泛泛的臧否褒貶可比。

他箋釋錢、柳因緣詩時，亦經常運用此一評價準則，並提醒讀者：

<sup>192</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656。

<sup>193</sup>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34。

<sup>194</sup> 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頁 58。

<sup>195</sup> 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頁 61。

牧齋博學能詩，凡所吟詠，用事皆適切不泛，辭意往往雙關。讀者若不察及此端，則於欣賞其幽美之處，尚有不足也。<sup>196</sup>

用典「適切不泛」正是「混合古今」的另一種表述。他深賞錢詩「道人未醒羅浮夢，正憶新粧萼綠華」，以為「言語妙絕天下」，因為該詩「借永興寺之綠萼梅，以譬真誥中神女之萼綠華，即河東君」，正是「詞旨關聯，今古貫通」的絕佳例子。<sup>197</sup> 又柳如是書札嘗言「某翁願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纓人耳」，陳寅恪相信此句表面上出自《楚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及《列仙傳》鄭交甫事，實際上暗用了北宋名妓龍靚的詩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做武陵人」，因而案曰：

河東君尺牘以「交甫」「濯纓」二事連用，當出於龍靚之詩，用事遣辭，可謂巧妙。<sup>198</sup>

類似的批評方式在《柳如是別傳》中實在不勝枚舉，茲再錄數例，以供隅反：

今觀沈序孫賦，古典今事，參錯並用，頗為切當。讀者取此集中錢柳諸詩以證其本事，則知兩文之經牧齋賞定，殊非偶然也。<sup>199</sup>

牧齋運用古典今事，可稱巧妙適切矣。<sup>200</sup>

此詩融會古典今典，辭語工切，意旨深長，殊非通常文士所能為。<sup>201</sup>

或謂牧齋己身曾任浙江鄉試主考，合古典今典為一辭，甚為巧妙。<sup>202</sup>

細繹牧齋所作之長箋，皆借李唐時事，以暗指明代時事，並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蛻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sup>203</sup>

陳寅恪早期以為解釋「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sup>204</sup>原因是闡明今典「須考知此事發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滿足了這條件，「又須推得作者有聞見之可能」，<sup>205</sup>否則作者也不可能取之入文。後來他發現研究古典亦不易，因為真要「通解作者遣詞用字之

<sup>196</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633。

<sup>19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634。

<sup>198</sup> 以上引文俱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390。

<sup>19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13。

<sup>20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542。

<sup>201</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頁 888。

<sup>202</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頁 930。

<sup>203</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頁 1021。

<sup>204</sup>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34。

<sup>205</sup>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34-235。

妙」，除了要知道古典最初出處，還要引用「非最初，而有關者」，<sup>206</sup>於是有「最初出處」、「第貳出處」之說。<sup>207</sup>如前面提到「交甫」「濯纓」最初見諸《楚辭》和《列仙傳》，而龍靚的詩則是意思相關的第二出處。考釋古、今典故的難處俱與各種事件、文本的排列先後有關，假如無法確定相關史事，這套審美原則也不能發揮作用。如〈有美詩〉有「換骨飲珉璫」一句：

錢注析「換骨」與「飲珉璫」為兩典而合用之，固自可通。但牧齋詩意，當不僅限於古典。河東君雖以善飲著稱，此句疑更有實指。今未能詳知，姑識於此，以俟續考。<sup>208</sup>

類似例子尚有「河東君此詩結語必有本事，究何所指，殊難確言」，<sup>209</sup>以及「此首在湖上草諸詩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尋常遊覽之作，必有為而發。惜今不能考實」等。<sup>210</sup>不知今事的實指，便不能判斷詩中所用典故是否貼切，因而亦難以評論詩歌的優劣好壞。由此可知，陳寅恪以古典、今典融合與否作為文學評鑑的標準，實質上仍是建立在時間座標內的批評方法，與他過去的研究並無二致，不過這種方法在此闡述得更為簡潔清晰，儼然構成自足的體系。

## 九、結語：文學研究史上的恰當定位

在 1920 年代左右，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並藉小說研究推廣他的主張：「我為甚麼要考證《紅樓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sup>211</sup>他大力抨擊傳統的索隱紅學，認為只有作者和版本的考證才是科學研究的範圍，摒棄那些探求作品情節背後的歷史本事考索，以為後者只是猜笨謎。

胡適開創的學術範式在學界有壓倒性的影響，但當中有兩個問題仍然未能圓滿解決。其一是以情節為核心的本事考證一直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面向，縱是胡適的考證紅學亦無法完全迴避相關議題，結果他本人提出的「自敘傳說」，亦背負索隱的嫌疑。他的追隨

<sup>206</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1。

<sup>207</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12。

<sup>208</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605-606。

<sup>209</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頁 311。

<sup>210</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頁 463。

<sup>211</sup> 胡適：〈廬山遊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4 冊，頁 152。

者俞平伯便有這樣的疑問：「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至於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sup>212</sup>其二是以科學之名把「研究」僅僅局限在作者和版本考證的範圍，把文學作品與一般的歷史文獻等同起來，這種研究方法並未能完全對應文學之為文學的特質。文學文本與其他書寫最大分別正正在於前者是審美的對象，因此完整的文學研究必須正視文本中的美學元素，建立客觀的批評觀念架構，減少主觀臆斷的成份。

明白當時學術範式內部所面對問題，便可知道陳寅恪的文學研究實有非常深刻的意義。他一方面以胡適津津樂道的科學態度考證各種史實的真偽、次序，致力通解文本辭旨；另一方面重拾蔡元培所重視的索隱傳統，考釋文本涉及的歷史典故和當時本事。陳寅恪不但統攝了蔡、胡之學，還以古典、今典的融會辨別作品高下，沒有逃避藝術審美的問題，比蔡、胡的研究更能對應文學的特質。可惜自錢鍾書把陳寅恪的文學研究定性為帶有貶義的「實證主義」，不少學者亦把陳氏的著述限制在史學範疇內，或是沿用錢鍾書的思路，以「詩史」之名套在他的頭上，並未能認真正視和整合他對文學的看法。

通過前文的討論，大家可以看到陳寅恪在文學領域內確實作出了不少貢獻。他深入細緻地辨析文本辭旨，重現作品出現的時空環境，以及當中所用典故詞句與前代及當代詩人的關係，儘可能在通解的基礎上作出恰當的評論，還鑄造了今典、古典一組術語總括自己的批評標準。在他的演繹下，文本、歷史、詮釋、批評環環相扣，史學的文獻考證與文學的價值判斷變成有機的組合。儘管他的研究成果未必人人認同，<sup>213</sup>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他的著述同時回應了文學研究中科學與審美兩種截然不同的要求，突破胡適範式遺留下來的樽頸問題，在 20 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史上實有不可動搖的重要位置。

<sup>212</sup> 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該文發表於 1925 年 2 月 7 日，見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343。

<sup>213</sup> 如本文第五節提到陳寅恪對「惜惜鹽」一事的考釋便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 徵引文獻

### 古籍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Bai, Ju-yi (Author); Zhu, Jin-cheng(Annotator). *Bai, Ju-yi Ji Jian Jiao*.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唐·李商隱著，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Li, Shang-yin (Author); Feng, Hao(Annotator). *Yu Xi Sheng Shi Ji Jian Zhu*.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Wu, Zeng. *Neng Gai Zhai Man L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Ben】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Guo, Mao-qian. *Yue Fu Shi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Qiu, Zhao-ao. *Detailed Annotations of Du, Fu's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Pu, Qi-long. *Du Du Xin 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 近人論著

- 卞孝萱：〈對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一些意見〉，載《文學遺產》編輯部編：《文學遺產選集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92-99。【Bian, Xiao-xuan. "Some Opinions to Chen, Yin-ke's A Draft Annotation of Yuan Bai Poems", in *Literary Heritage Anthology*, Vol.3, 1960, pp. 92-99】
- 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Wang, Yong-xing. *Chen, Yin-ke Xian Sheng Shi Xue Shu Lue Ga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Peking University Zhong Guo Zhong Gu Shi Yan Jiu Zhong Xin(Editor). *Ji Nian Chen, Yin-ke Xian Sheng Dan Chen Bai Nian Xue Shu Lun Wen J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Hans-Georg Gadamer(Author); Hong, Han-ding(Translator). *Truth and Method*.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左漢林：〈論陳寅恪與錢鍾書的「詩史」之爭〉，《湖北社會科學》2004年第10期（2004年10月），頁51-52。【Zuo, Han-lin. “Lun Chen, Yin-ke yu Qian, Zhong-shu de ‘Poetry as History’ Zhi Zhen”, *Social Science in Hubei*, Vol. 2004.10, 2004.10, pp.51-52】
- 向天淵：〈「文史互通」與「詩史互證」〉，《中國比較文學》1999年第1期（1999年3月），頁107-118。【Xiang, Tian-yuan.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s.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Epic and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Vol. 1999.1, 1999.3, pp.107-118】
- 牟潤孫：〈陳寅恪與錢鍾書——從楊太真入宮時是否處女說起〉，《海遺叢稿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Mou, Run-sun. “Chen, Yin-ke yu Qian, Zhong-shu——Cong Yang, Tai-zhen Ru Gong Shi Shi Fou Chu Nu Shuo Qi”, *Hai Yi Cong Gao Er 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Wang, Rong-zu. *Biography of Historian Chen, Yin-k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84】
-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何暉等編：《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Yu, Ying-shi. “Wo Suo Ren Shi de Qian, Zhong-shu Xian Sheng”, in He, Hui(Editor). *Yi Cun Qian Si*.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1999】
- 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Li, Yu-mei. *Chen, Yin-ke's Historiography*. Hongkong: Sanlian Bookstore, 1997】
- 李春棠、林順曾、方早成：〈陳寅恪教授和「元白詩證史」〉，《史學月刊》1959年第4期（1959年4月），頁18-20。【Li, Chun-tang and Lin, Shun-zeng and Fang, Zao-cheng. “Professor Chen, Yin-ke and ‘Yuan Bai Shi Zheng Shi’”,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59.4, 1959.4, pp.18-20】
- 李洪岩：〈關於「詩史互証」——錢鍾書與陳寅恪比較研究之一〉，《貴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1996年10月），頁48-52。【Li, Hong-yan. “Concerning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One of the Comparatively Research about Qian, Zhong-shu and Chen, Yin-ke.”,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Vol. 1996.4, 1996.10, pp.48-52】
- 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Wu, Tai-chang. *Wo Ren Shi de Qian, Zhong-shu*.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季羨林：《季羨林談讀書治學》（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Ji, Xian-lin. *Ji, Xian-lin Tan Du Shu Zhi Xue*. Hongkong: Sanlian Bookstore, 2006】
- 周勛初：《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Zhou, Xun-chu. *Dang Dai Xue Shu Yan Jiu Si Bian (Zeng Ding B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俞平伯：〈《紅樓夢辨》的修正〉，《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41-349。

【Yu, Ping-bo. “Hong Lou Meng Bian de Xiu Zheng”, *Yu, Ping-bo's comments abou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pp.341-349】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Hu, Wen-hui. *An Annotation of Chen, Yin-ke's poetry*. Guangdong: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胡守為：〈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88-114。【Hu, Shou-wei (Author). “Chen, Yin-ke Xian Sheng de Shi Xue Cheng Jiu yu Zhi Shi Fang Fa”, *Zhong Shan Da Xue Ji Nian Chen, Yin-ke Jiao Shou Guo Ji Xue Shu Tao Lun Hui Mi Shu Zu*(Editor). *Ji Nian Chen, Yin-ke Jiao Shou Guo Ji Xue Shu Tao Lun Hui Wen Ji*. Guangd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88-114】

胡守為主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Hu, Shou-wei(Editor). “*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and Guo Xue Study*”.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胡守為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Hu, Shou-wei (Editor). *Chen, Yin-ke and 20 Century China Scholarship*.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Hu, Song-ping(Editor). *Hu, Shi-zhi Xian Sheng Nian Pu Chang Bian Chu Gao*, Vol.10.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84】

胡適：《紅樓夢考證》，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Hu, Shi(Author). *Hong Lou Meng Kao Zheng*, in Ouyang, Zhe-sheng(Editor). *Hu, Shi Wen Ji*, Vol.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胡適：〈《西遊記》考證〉，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Hu, Shi(Author). “*Xi You Ji Kao Zheng*”, in Ouyang, Zhe-sheng(Editor). *Hu, Shi Wen Ji*, Vol.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胡適：〈廬山遊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Hu, Shi (Author). “*Lu Shan You Ji*”, in Ouyang, Zhe-sheng(Editor). *Hu, Shi Wen Ji*, Vol.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胡適：《序跋集》，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Hu, Shi (Author). *Xu Ba Ji*, in Ouyang, Zhe-sheng(Editor). *Hu, Shi Wen Ji*, Vol.8.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胡適：《胡適日記》，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17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Hu, Shi(Author); Ji, Xian-lin(Editor). *Hu, Shi Quan Ji*, Vol.17. Hefei: An 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胡曉明：〈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詩與文化心靈》（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45-256。【Hu, Xiao-ming. “Chen, Yin-ke and Qian, Zhong-shu: A latent dispute of poetry paradigm”, *Shi Yu Wen Hua Xin L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pp.245-256】
- 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年）。【Hong, Han-ding(Editor). *Li Jie Yu Jie Shi: Quan Shi Xue Jing Dian Wen Xuan*.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夏承燾：〈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國文月刊》1949 年第 78 期（1949 年 4 月），頁 8-11。【Xia, Cheng-tao. “Du ‘Zhang Hen Ge’: Jian Ping Professor Chen, Yin-ke’s ‘Annotation’”, *Guo Wen Yue Kan*, Vol. 1949.78, 1949.4, pp.8-11】
- 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Xia, Nai. *Xia Nai Dair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郝潤華：《〈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方法》（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Hao, Run-hua. *‘Qian Zhu Du Shi’ and Poetry Histroy Hu Zheng Fang Fa*. Hefei: Huangshan Bookstore, 2000】
-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6 年）。【Xu, Guan-san. *Xin Shi Xue Jiu Shi Nia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86】
- 陳先明：〈試論陳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證研究〉，《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5 期（2003 年 5 月），頁 62-65。【Chen, Xian-ming. “Analysis of Chen, Yin-ke’s Practice of Mutual Proof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003.5, 2003.5, pp.62-65】
-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Chen, Yan (Commentator); Cao, Zhong-fu (Editor). *Song Shi Jing Hua Lu*. Chengdu: Ba Shu Publishing House, 1992】
- 陳建華：〈從「以詩證史」到「以史證詩」——讀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札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74-82。【Chen, Jian-hua. “From History to Poetry: Notes on Chen, Yin-ke’s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2005.6, 2005.12, pp.74-82】
- 陳寅恪：〈讀秦婦吟〉，《清華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1936 年 10 月），頁 951-968。【Chen, Yin-ke. “Du Chin Fu Yi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1:4, 1936.10, pp.951-968】
- 陳寅恪：〈長恨歌箋證（元白詩箋證稿之一）〉，《清華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1947 年 10 月），頁 1-34。【Chen, Yin-ke. “Annotations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One of Yuan Bai Shi Jian Zheng Gao)”,

-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4:1, 1947.10, pp.1-34】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Chen, Yin-ke. *Initial Discussions On Political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陳寅恪：〈致劉銘恕函〉，《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Chen, Yin-ke. “Zhi Liu, Ming-shu Han”,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Chen, Yin-ke. *Initial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Sui and Tang Dynasty*.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陳寅恪：《讀書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Chen, Yin-ke. *A Xollection of Reading Notes I*.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陳寅恪：《詩集附唐貫詩存》（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Chen, Yin-ke. *A Collection of Chen, Yin-ke and Tang Guan's Poems*.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陳寅恪：《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Chen, Yin-ke. *Handouts and Drafts*.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2】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Chen, Yin-ke. *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I)*.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Chen, Yin-ke. *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II)*.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Chen, Yin-ke. *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III)*.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319-332。【Chen, Yin-ke. “Lun Han, Yu”,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1*.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319-332】
-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188-200。【Chen, Yin-ke. “Tao Hua Yuan Ji Pang Zheng”,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1*.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188-200】
- 陳寅恪：〈讀東城老父傳〉，《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333-342。【Chen, Yin-ke. “Du Dong Cheng Fu Lao Zhuan”,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1*.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333-342】
- 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34-242。【Chen, Yin-ke. “Du Ai Jiang Nan Fu”,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1*.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234-242】
- 陳寅恪：〈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60-64。【Chen,

- Yin-ke. "Shu Du, Shao-ling Ai Wang Sun Shi Hou",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60-64】
- 陳寅恪：〈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193-196。【Chen, Yin-ke. "Xu Da Qi Jing She Yin Yuan Qu Ba",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193-196】
-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17-223。【Chen, Yin-ke. "Xi You Ji Xuan Zang Di Zi Gu Shi zhi Yan Bian",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217-223】
- 陳寅恪：〈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90-292。【Chen, Yin-ke. "Chan Hui Mie Zui Jin Guang Ming Jing Ming Bao Chuan Ba",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290-292】
- 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81-88。【Chen, Yin-ke. "Shun Zong Shi Lu Xu Xuan Guai Lu",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81-88】
- 陳寅恪：〈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57-59。【Chen, Yin-ke. "Yi Du Shi Zheng Tang Shi Suo Wei Za Zhong Hu Zhi Yi",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57-59】
- 陳寅恪：〈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65-80。【Chen, Yin-ke. "Yuan Bai Shi Zhong Feng Liao Qian Wen Ti",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65-80】
- 陳寅恪：〈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9-58。【Chen, Yin-ke. "Li, De-yu Bian Si Nian Yue ji Gui Zang Chuan Shuo Bian Zheng",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9-58】
- 陳寅恪：〈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跡詩〉，《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300-303。【Chen, Yin-ke. "Yu, Xin Ai Jiang Nan Fu yu Du, Fu Yong Huai Gu Ji Shi",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300-303】
- 陳寅恪：〈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之最簡易解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97-299。【Chen, Yin-ke. "Ji Qiu Zhi Zhi Zhi Yu Wen Huang Zhi Zui Jian Yi Jie Shi", *Drafts from Golden and Bright Chamber Series 2*.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297-299】
- 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1-107。【Chen, Yin-ke. "Lun Zai Sheng Yuan", *Writings from the Hall of Cold Willow*.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1-107】
-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162-163。【Chen, Yin-ke.

- “Zhu Yan Feng Tu Jue Tong Kao Xu”, *Writings from the Hall of Cold Willow*.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pp.162-163】
-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Chen, Yin-ke. *A Draft Annotation of Yuan Bai's Poems*.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5】
-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Chen, Wei-zhao. *A History of Redolog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陳廣宏：〈小說家出於稗官說新考〉，《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9-38。【Chen, Guang-hong. “Xiao Shuo Jia Chu Yu Bai Guan Shuo Xin Kao”, *Wen Xue Shi De Wen Hua Xu Shi: Zhong Guo Wen Xue Yan Bian Lun J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9-38】
- 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Guo, Yu-wen. *Redology: From Zhi Yan Zhai to Zhang Ailing*, Taipei: Le Ren Bookstore, 2004】
- 張求會輯錄：〈陳寅恪手批《宋詩精華錄》〉，《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29-134。【Zhang, Qiu-hui(Editor). “Chen, Yin-ke's Handwritten Comments in Chen Yan's Anthology of Song Poems”, *Literary Heritage*, Vol. 2006.1, 2006.1, pp. 129-134】
- 張求會：《陳寅恪叢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Zhang, Qiu-hui. *Chen, Yin-ke Cong Kao*.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項念東：《20世紀詩學考據學之研究：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Xiang, Nian-dong. *Study on Twenty Century Poetry Textual Research: Take Cen, Zhong-mian and Chen, Yin-ke as Sample*.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雷內·韋勒克著，張今言譯：《批評的概念》（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René Wellek(Author); Zhang, Jin-yan(Translator). *Concepts of Criticism*.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1999】
-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Jiang, Tian-shu. *Chen, Yin-ke's Chronicles (Updated Book)*.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Liu, Meng-xi. *Hong Lou Meng yu Bai Nian Zhong Guo*.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
- 劉隆凱整理：《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Liu, Long-kai(Editor). *Chen, Yin-ke's "Yuan Bai Shi Zheng Shi" Jiang Xi Ce Ji*. Wuhan: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Cai, Yuan-pei. *Shi Tou Ji Suo Yi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蔡鴻生等：《中西學術名篇精讀：陳寅恪卷》（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Cai, Hong-sheng. *Zhong Xi Xue Shu Ming Pian Jing Du: Chen, Yin-ke*. Shanghai: Zhong Xi Book Company, 2014】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Qian, Zhong-shu. *Guan Zhui Bia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1】
-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178-182。【Qian, Zhong-shu. “Gu Dian Wen Xue Yan Jiu Zai Xian Dai Zhong Guo”, *Xie Zai Ren Shang Bian Shang de Bian Shang*.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2, pp.178-182】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Qian, Zhong-shu. *Tan Yi Lu*.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7】
-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Qian, Zhong-shu. *Song Shi Xuan Zhu*.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14】
- 戴燕：〈文史殊途——從梁啟超、陳寅恪的陶淵明論談起〉，《中華文史論叢》總第86輯（2007年12月），頁181-205。【Dai, Yan. “Reaching the Same Object by Different Routes: From Liang, Qi-chao and Chen, Yin-que’s Discourses on Tao, Yuan-ming”, *Zhong Hua Wen Shi Lun Cong*, Vol. 86, 2007.12, pp. 181-205】
- 謝思焯：〈「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2015年2月），頁169-178。【Xie, Si-wei. ‘Hybrids’ and ‘Hybrids Barbarian’: Discussion of An, Lu-shan’s Life world”,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015.1, 2015.2, pp.169-178】
-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Yan, Geng-wang. *Zhi Shi San Sh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Eliot, T. S.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 Ronald Bontekoe. *Dimensions of the Hermeneutic Circle*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6.)

#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 Analysis of Chen, Yin-ke's Ideas of Criticism**

Lee, Kwai-sang

( Received April 19, 2017 ; Accepted October 17, 2017 )

## **Abstract**

Chen, Yin-ke's distinctive approach, which is called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ve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However, since Qian, Zhong-shu's harsh criticism of his works, many scholars tended to emphasize that Chen's voluminous works were only studies of history,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terature. Almost none of them seriously consider his views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olating Chen from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is not only inconsistent with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his works, but also obscures his 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regard to such kind of opinion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comments made by Qian, Zhong-shu, then examines the positioning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en's study,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literary appreciation,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Chen, Yin-ke's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Keywords:** Chen, Yin-ke, Literature, Criticism, History, Interpretation

